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Pierre Bourdieu, looking slightly upwards and to the right. The image is the background for the book cover.

防火牆 contre-feux

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布赫迪厄

Pierre Bourdieu◎著

孫智綺◎譯

麥 田 人 文

王德威／主編

Contre-Feux: Propos pour servir à la résistance contre l'invasion néo-libérale
Copyright © Éditions RAISONS D'AGIR, avril 1998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by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麥田人文57

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Contre-Feux

Propos pour servir à la résistance contre l'invasion néo-libérale

作者／布赫迪厄 (Pierre Bourdieu)

譯者／孫智綺

主編／王德威

責任編輯／吳惠貞 蔡雅琪

編註協力／蔡筱穎

發行人／涂玉雲

出版／麥田出版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02-23517776 傳真：02-23519179

發行／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愛國東路100號1樓

電話：02-23965698 傳真：02-23570954

網址：www.cite.com.tw E-mail：service@cite.com.tw

郵撥帳號：18966004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字樓504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Cite(M) Sdn. Bhd. (458372 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 3833 傳真：603-9056 2833

E-mail：citekl@cite.com.tw

初版一刷／2002年8月

售價／20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986-7895-61-4

防火牆

contre-feux

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Propos pour servir
à la résistance
contre l'invasion
néo-libérale

布赫迪厄

Pierre Bourdieu◎著

孫智綺◎譯

目錄

前 言	7
國家的左手和右手	11
索雷斯的廬山真面目	25
從外國人的地位來測試政黨候選人	31
藉理性之名行濫權之實	37
鐵路員工的真話	41
抵擋一個文明的破壞	45
全球化的迷思及歐洲社會福利國家	53
德國銀行總裁提梅耶的想法	77
學者，經濟學及社會運動	87
為一個新的國際主義而寫	97

電視，新聞業，及政治	111
再談電視	123
這些宣稱我們不負責任的「負責人」	135
今天工作到處都是不穩定的	139
失業者運動，一個社會奇蹟	149
破壞性的知識分子	153
新自由主義，一個剝削到底的（正在實現的）烏托邦 ...	157
引用書目	171

前言

我之所以下定決心集結出版這些絕大部分尚未發表過的文章，是因為我覺得「防火牆」所一直想要抵擋的危險，並非偶發零星的。而這些因應不同場合而寫的文章，雖然有點雜亂，仍不失為對抗新自由主義禍害的有力武器。*

我不想未卜先知，也不輕易涉入超出我能力範圍以外之事。所以，每一次，如果不是義憤填膺，受到某種

* 冒著增加語調和風格不連貫（這和發言當時情況的差異性有關）的危險，我還是決定依照時間順序來介紹我在這裡所選取的文章，以便讓讀者更能感受到當時的時空背景。我會零星加入一點參考書目，讓讀者可以深入這裡所提的論述。

責任感所驅使，我也不會站出來公開表態。

知識分子的理想，只要是有共識之處，我都曾試圖去遵從，儘管這些理想的實現，困難重重¹。但是，如果為了讓其更有效力而我必須親自介入，我有信心可以掀起一場動員或辯論，結果就算是沒頭沒尾、有一陣沒一陣地出現在媒體中，我相信也能打破意見一致的表面，撼動主流論述象徵力量的核心。

¹ 在我所有的集體發言裡，特別是在研究及高等教育集思會（Association de réflexion sur les enseignements supérieurs et la recherche, ARESER）、阿爾及利亞知識分子國際後援會（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soutien aux intellectuels algériens, CISIA），及作家國際會議（Parlement international des écrivains——這個會議已非我所認得的）的發言裡，我只選擇刊在《解放報》上那篇名為〈從外國人的地位來測試政黨候選人〉的文章，並經過其他共同作者的同意，其中看得見的作者有 Jean-Pierre Alaux，看不見作者則有 Christophe Daadouch、Marc-Antoine Lévy 及 Danièle Lochak 等，他們都是報紙那些負責所謂自由論壇的記者自動且司空見慣的審查制度下的受害者：這些記者負責人總是在尋找和特定人名相聯繫的象徵資本，不喜歡簽署字母縮寫或簽署好幾個名字的文件——這也正是有礙於知識分子集體形成的困難之一，而且是最首要的困難——他們傾向於讓較不為人知的名字消失，不是透過協商，就是像在這個例子裡，連協商的餘地都沒有，就讓這些名字消失。

防火牆

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國家的左手和右手*

問：最近一期您所主持的雜誌，是以苦難為主題¹。裡面有許多訪談的對象，是在媒體上沒有聲音的人：貧窮郊區的年輕人、小農、社會工作者。其中，一個問題國中的校長發出他個人的不平：與其說他是知識傳遞的守護者，還不如說是某種派出所警察。您認為這種消遣的說法有助於了解社會的不滿嗎？

布赫迪厄：在我們所做有關社會苦難的調查裡，我們碰到許多飽受社會衝突折磨的人，就像這個國中校

* 這篇對談是由R. P. Droit及T. Ferenczi進行採訪，刊載在1992年1月14日的《世界報》。

長。我還可以舉這個負責法國北部某小城一個問題郊區的計畫協調人為例。他所要面對的衝突，是所有社會工作者（社工人員、輔導人員、基層行政人員，以及越來越多的學校老師）所能忍受的極限。這些社會工作者構成了我所謂的「國家的左手」（國家裡，所有那些需要大量開銷的部會），而這些部會也是過去社會鬥爭所遺留的產物。與其相對的是「國家的右手」，就是那些法國國立行政學校畢業的菁英所充斥的財政部、公民營銀行及部長辦公室。許多我們所參與（及將會參與）的社會運動，都是為了表達小國家貴族（國家的左手）對大國家貴族（國家的右手）的不滿。

問：您如何解釋這種憤怒，這些形式的絕望及反抗？

布赫迪厄：我想是因為國家的左手覺得國家的右手不再知道，或更糟的，再也不想知道國家的左手到底在做什麼。總之，就是不想再付出代價。這些人一個主要的絕望之因，在於國家從許多屬於其管轄負責的社會領域中退出，或正在退出：像國宅、公共電視及廣播、國

立學校、國立醫院等等。對某些人來說，更是難以置信或難以接受，因為人們對一個社會黨執政的國家，總是期待它能做為社會福利的保障者，讓每個人，不分貧富貴賤，皆可享有社會福利。一般所描述的政治危機，反國會主義，其實是一種對國家做為公共利益負責人的絕望。

社會黨人並不如他們所宣稱的那麼社會主義這一事實，也不再引起人們強烈的反感：在這個艱困的時代，可以運作的空間本來就是十分有限。但是，令人訝異的是，這些社會黨人竟然可以把社會領域（國有部門）壓縮到這種程度：首先，在事實上，透過各種措施或策略（我將只點名媒體），來取消**社會福利國家**所爭取到的社會權益，然後特別是在公開言論中，大肆讚美私人企業（好像企業精神只適用於企業），大力鼓吹私人利益。這些都讓人覺得有些唐突，尤其是對那些站在第一線的社會工作者來說，因為他們必須去彌補最難以忍受的市場失靈之處，卻沒有被賦予完成其任務所需之資源。這些社會工作者又怎麼會沒有被欺騙或被否認的感覺呢？

我們老早就應該了解到，他們的反抗，早已超過薪

水的範圍，儘管薪水是對工作者及其工作價值一個清楚的指標。對一個職務的藐視，首先就表現在薪俸的微薄上。

問：您是否認為政治領導者的運作空間真的如此有限？

布赫迪厄：它大概沒有人們要我們相信的那麼有限。總之，還有一個領域，統治者可以運作自如，那就是象徵領域。國家的所有成員必須謹守好的榜樣，特別是當國家標榜要伸張弱勢者的利益時。但是當我們看到貪污（有時幾乎是公開為之，像高級官員的加給），或公部門的出賣（出賣這個字或許太強烈：我要指的是被安插到私人企業養老的退休官員），以及所有為私人目的而侵占公共資產及公共利益的行為：像濫用私人，徇私偏袒（我們的統治者有許多「個人至交」），利益交換時，又怎麼會不心生懷疑？

而我說的還不是象徵利益！電視跟賄賂一樣，助長了公民道德的墮落。電視捧紅了政治上、學術上愛做秀的人，這些人只想凸顯自己、表現自己，和公務員及基

層活動分子為集體利益的默默奉獻大異其趣。也因為自私地只想凸顯個人（常因而損及對手），才造成「宣布效果」的大行其道。對許多的部長來說，一個措施要能被「宣告」出來才有效果，而且只要一被公開，就算是執行了。重大貪污案件的揭露之所以會引起公憤，就是因為其所鼓吹的道德和實際作為有段距離，而這些貪污，也不過是所有那些司空見慣的小「弱點」裡最糟的情況（比如想擺闊，急著收受物質上或象徵上的特權）。

問：面對您所發掘的這些情況，在您的眼中，人民有何反應？

布赫迪厄：我最近在讀一篇德國作者寫的有關古埃及的文章。作者指出，當人民對國家和公共福利進入信心危機的時候，可以看到兩樣東西的大放異彩：在領導者那裡，是貪污腐敗，這和對公共事務之漠視有關；在被統治者那裡，則是個人的宗教狂，因為他們對於訴諸現世，已經不抱任何希望。同樣地，今天，我們感覺到，那些被國家棄之不顧的公民（實際上，國家只要求

公民在物質上做強制性的奉獻，一點也不在乎公民對國家的忠心和熱忱）也開始摒棄國家，把國家當成一股外來的勢力，可以用來極大化其個人利益。

問：您提到當權者在象徵領域中擁有寬大的運作空間。這不只牽涉到做為榜樣的行為，還包括可以產生動員效果的理念及發言。就最後這一點來看，這正是目前所欠缺的？

布赫迪厄：我們常談到知識分子的沉默。讓我更感到訝異的是，政治人物的沉默。他們真的缺乏可以產生動員效果的理念。或許這是因為政治的專業化，以及對那些想從政者所設下的條件門檻，造成有理念的人越來越不見容於政治圈。也或許是因為政治活動的定義隨著一群專職人員的產生而改變，這些專職人員在學校（政治系裡）所學到的是，為了要表現出專業的嚴謹，避免迂腐過時的形象，最好只談管理，而不談自治，總之，就是要給人一副（我是說在語言上）合乎經濟理性的樣子。

由於自限於狹隘的經濟主義以及國際貨幣基金

(FMI)的短視近利(造成南北關係之破壞)，這些在經濟學上一知半解的人，當然就會忽略造成物質及精神困苦的真正成本(短期成本及特別是長期成本)，而這都是經濟上被合法化的**現實主義**(Realpolitik)政策所造成的必然結果：違法犯罪，酗酒車禍等等。我們再次看到，只在乎財政收支平衡的「國家的右手」，是如何地忽視「國家的左手」，而「國家的左手」卻必須面對預算經濟^[1]下所造成的沉重社會成本。

問：國家所作所為所依賴之基本價值，是不是就不再具有公信力？

布赫迪厄：通常是這些基本價值的守護者自己最先起頭蔑視這些價值。翰恩(Rennes)會議^[2]及大赦法^[3]，比長達十年的反社會黨宣傳更使社會黨人信譽掃地。一個「轉向」(換邊)的活動分子比十個政敵更具殺傷力。為期十年的社會黨政權，則是完成了對國家信心之拆解以及對福利國家之破壞(早在七〇年代，便以自由主義之名開始此一破壞工作)。我想到的特別是有關住宅的政策^[4]。這個政策明目張膽的就是要把小資產階級

抽離集體住所（藉此抽離集體主義），使其固定在獨棟或共有公寓的私人財產中。從某一方面來看，這個政策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它的結果，卻帶來了我剛才提到的社會成本。因為這個政策是造成空間隔離的主因，同時亦導致隨之而來的「郊區問題」。

問：那麼您所謂的理想，就是指回歸國家、回歸公共事務。但是並非所有的人都這麼想。

布赫迪厄：那要看你指的所有的人是誰？是那些媒體上寫文章的人嗎？是那些鼓吹國家越小越好的知識分子嗎？是那些過度草率地了結公眾利益的人嗎？這個例子正好說明了人們是如何運用「大家都這麼想」這個藉口，而把值得討論的話題，一下子變成了無庸置疑的共同信仰。我們應該要去分析這些「新知識分子」是如何地集體創造出一種有利國家縮小的氣氛，或從更廣大的層面來看，一種有利於順從經濟價值的氣氛。我這裡想到的是，所謂的「回歸個人主義」，一種自我實踐的預言，使得福利國家的哲學基礎逐漸被破壞，特別是有關集體責任的概念（在職業傷害、疾病或貧困時）——這

是社會思想（及社會學思想）的主要成果。回歸個人，也就是讓我們可以「譴責受害者」，因為受害者要為自己的不幸負責，也讓我們可以向受害者宣傳「自求多福」，這一切都是口口聲聲要減輕企業負擔的幌子下進行的。

法國68學運（撼動所有小文化資產所有者的象徵革命）危機所引起的事後恐慌反應，形成了有利於文化重建（加上「意料外」的共產政權之瓦解）的環境，以此之名，法國政治學院的思考模式^[5] 取代了毛澤東思想。今天的知識圈，是以生產和灌輸「新知識分子」為目的的鬥爭場所，所以對知識分子及其政治上的角色有了新定義，對哲學及哲學家也有了新定義，從今以後只需空泛地討論政治哲學，而社會科學也縮水為選情分析及對商業化的民意調查之草評。柏拉圖用了一個十分傳神的字來形容這些人：“doxosophe”，我把它翻做「自以為無所不通的意見專家」，他們懂得用企業家、政治家和政治新聞記者（也就是那些花得起錢做民調者）所慣用的話語來提出政治問題。

問：您剛提到柏拉圖的說法。關於這點，社會學家的態度是否比較接近哲學家？

布赫迪厄：社會學家正如哲學家，是和意見專家相對立，因為社會學家會去質疑那些明顯的事實（理所當然的自明之理），那些不管是自己或他人看起來都有問題的自明之理。這是讓那些意見專家最訝異之事，因為他們把拒絕接受「理所當然之事」視為一種政治偏見：用亞里斯多德的說法，所謂的老生常談（lieux communs），是指辯論時所使用的那些概念或論點，但這些概念或論點本身卻未受到討論。

問：從某個意義來看，您是否想把社會學家放在哲學家—國王的位置上，也就是唯一知道真正的問題所在之處者？

布赫迪厄：我最想護衛的，是知識分子批判之可能性及必要性，首先，就是要去批判意見專家所散播的臆斷（doxa，先入為主的意見）。沒有真正的批判力來制衡，就沒有真正的民主。知識分子正是最重要的批判力之一。所以我認為對具批判性的知識分子（已故或尚存

者，像馬克思、尼采、沙特、傅柯，以及其他我們歸在68學運標籤之下的知識分子）之摧殘，和公共事務的瓦解是一樣的危險，而這些都是以全面的文化復興之名為之。

當然，我也希望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能一直扛起落在他們頭上的歷史責任，把他們的道德權威及專業能力發揮在他們的行動當中，就像納給（Pierre Vidal-Naquet）^[6]把他對歷史方法的掌握，運用在對歷史濫用的批判上²。但話說回來，用克勞茲（Karl Kraus）^[7]的話來說，「在兩害之間，我拒絕取其輕。」如果說我一點都不包容「不負責任」的知識分子，那我更不喜歡那些千變萬化「無所不通」的當權者，這些「通才」忙著在行政會議、記者招待會及螢光幕前到處插花。

問：那麼您希望知識分子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特別是在歐洲的整合當中？

布赫迪厄：我希望作家、藝術家、哲學家及學者，都能在他們各自專業的公共領域上發出聲音。我認為，如果知識運作的邏輯（推論及駁斥的邏輯）能延伸到公

共領域，則大家都會是贏家。今天，反倒是政治的邏輯（抹黑、口水戰、喊口號、亂貼標籤）被延伸到知識圈裡。最好是那些始作俑者，能夠克盡其公眾福利所要求之職責。

跨入歐洲這個層次，只是擴大普遍化的程度，在成為全球國家（即使是在學術研究裡，仍顯得遙遙無期）的道路上，進入另一個階段。事實上，如果只是用歐洲中心主義去取代舊帝國受傷的民族主義，我們所獲將十分有限。在這個十九世紀偉大的烏托邦陷入腐敗之時，我們更應該趕快去創造能重建可實踐理念之環境，讓這些理念凝聚我們的意志，卻不至於蒙蔽我們的意識。

巴黎，1991年12月

原書註以1 2 3表示，編者註以 [1] [2] [3] 表示。

¹ "La souffranc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90, decembre 1991, 104 p. et P. Boudieu et al., La misere du monde, Paris, Ed. Du Seuil, 1993.

² P. Vidal-Naquet, Les Juifs, la memoire et le present, Paris, La Decouverte, tome I, 1981, tome II, 1991.

[1] 預算經濟是根據歐盟公布的「穩定暨成長公約」，即發行歐元的國

家須承諾遵守預算紀律，讓預算赤字不得高於國民生產毛額百分之三。在德國、法國和義大利，這種預算經濟可以創造低通貨膨脹、降低債務和合理的赤字，不過迄未能配合國際貨幣基金或德國央行所謂能打破歐洲失業循環所須的勞力市場自由化和社會保障制度更彈性化。

- [2] 法國社會黨於1990年3月15至18日在翰恩舉行社會黨大會，內容涉及轉向新自由主義的辯論。
- [3] 1987年，政治獻金醜聞牽扯到社會黨，密特朗總統因此要求政府準備就選舉和政黨資金立法規範，1988年密特朗連任總統，依慣例須有大赦，次年的大赦法就是將過去四十年涉及政治獻金不法行為的人事一筆勾銷，雖然重新立法規範有關政治選舉或政黨政治獻金，但日後還是陸續爆發祕密獻金的醜聞。
- [4] 從第五共和初始的戴高樂總統時代起，就對法國公民的租屋傳統特別重視，因為身無一物且與國家控制無任何直接關係最是革命的溫床，68運動更加强這個傳統，所以右派基於粉碎集體主義、左派基於社會福利概念都主張所有公民皆有住屋。1970年代的住宅政策卻使小資產階級區別普羅階級，外來移民被集中到郊區的國民住宅內，這個空間隔離政策不僅是日後嚴重的郊區治安問題或第二代移民暴力問題的因素之一，也增長了以種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為訴求的極右派國民陣線聲勢。
- [5] 就政治學院學生的自我分析，他們的思考模式是快速烏瞰問題的全貌，舉一反三，但是並不深入研究，因此鄙視大學系統耗時費力的研究為無效率的思考。
- [6] 納給：法國著名的歷史學者，出生於1930年，屬於參與型的知識分子，被沙特認為是同路人，他的歷史研究極為多面向，希臘歷史、猶太歷史、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屠殺歷史等。
- [7] 克勞茲（1874-1936）：奧地利新聞記者、詩人和社會評論家，德

語文學中的諷刺大師。1899年創辦《火炬》期刊，被認為是一公之於眾的嘲諷陣地，也是他個人的編年史，他以為關於他的時代最不堪言的東西只能由該時代自身說出來，所以他用新聞報導此類最不耐久的材料來勾畫其時代的永久輪廓。

索雷斯的廬山真面目*

真正的索雷斯（Philippe Sollers）^[1]，終於現身了！這真是奇特的史賓諾沙式樂趣，能看到真理之展現、必要之實現及這一整個過程，誠如「真正的巴拉度^[2]」這個標題所招供的，象徵意味濃厚，而且幾乎是令人難以置信：從**真正的**到巴拉度，從假的前衛文學（及政治）到真的守舊政治。

內行的人會說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他們老早就知道，索雷斯以拿破崙三世以來前所未見的姿態，拋到總

* 這篇刊載在1995年1月27日《解放報》上的文章，是為了回應索雷斯發表於1995年1月12日《快報週刊》（*Express*）上一篇名為〈真正的巴拉度〉（*Balladur tel quel*）的文章而寫的。

統候選人（巴拉度）跟前的，既不是文學，更不是前衛，而是文學及前衛的外表。但是這個外表好到可以欺騙他演說的真正對象，所有那些他想巴結的人，巴拉度小圈圈裡出身名校的政治菁英們；對於兩點式論文的政治學文化略知一二，用餐大使級排場者；還有那些做秀高手，時常圍繞在**真正的**四周：看起來好像是作家，或哲學家，或語言學家，或樣樣精通，其實是鼯鼠技窮，什麼都不是；就像笑話裡，只知道文化的外表，卻不知其意義，只知道模仿大作家的姿態，其實是在摧殘文學。因此，只要他還能招搖撞騙，這個肆無忌憚的偽君子就會繼續嘲諷、羞辱、踐踏藝術，使得兩個世紀以來為文學自主性而努力的成果，從文化上、政治上，低聲下氣地臣服委屈在權力之下；而他糟蹋所有的作者，特別是那些在他為半官方報章雜誌所作的文學介紹中，他所賴以竄紅的大作家，像伏爾泰、普魯斯特或喬埃斯。

這種無傷大雅的冒犯，把放任化約到只剩下淫蕩，使得嘲諷也成為一種藝術。把後現代的「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anything goes）變成一種生活準則，放縱自己同時或接二連三腳踏好幾條船，等於是讓自己

「通吃卻一毛不拔」，批評觀眾社會卻高捧媒體明星，崇拜薩德（Sade）^[3] 卻也遵從教宗，信仰革命也護衛正確的文字拼寫，高捧作家卻殘殺文學。

那個看起來是、也自以為是自由實現者的人，其實是隨著場域力量而飄泊。有了密特朗（密特朗之於政治，或說得更精確一點，密特朗之於社會主義，正如索雷斯之於文學，或說得更精確一點，正如索雷斯之於前衛藝術）時代那些政治偏差所開的先例，他只是跟隨著當時政治及文學的所有起起伏伏一起擺盪。而他自以為獨特的歷程，實際上從統計數字上來看也平凡得很，代表的只不過是在一個政治及文學復興時期，沒有什麼特色的作家生涯：他代表一整個世代野心勃勃的作家之個人和集體歷史，這一群人，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之內，就從毛派、托洛斯基派等極左路線，跳到銀行、保險公司、政界、媒體界等權貴位置上，所以這群人對他當然就特別包容。

但他還是有他的獨特之處：他把自己變成背叛及棄絕的理論家，把所有拒絕其虛無風格的人，都貼上教條主義、食古不化，甚至恐怖主義的標籤（透過顛倒是非

來自圓其說)。他那無數次的公開表態，可以說是反反覆覆，更加深其叛逆的布爾喬亞性質，他那種在經過半個革命兩次向後轉後，還不是轉到原點，自曝鄉下年輕小資產階級猴急的醜相，成為莫理亞克（François Mauriac）^[4]和亞哈貢（L. Louis Aragon）^[5]寫序的題材。

巴黎，1995年1月

[1] 飛利浦·索雷斯（Philippe Sollers）：六〇年代左派知識分子、「新新小說」的創作健將，1958年出版《孤獨的好奇者》就被當時著名的文學家莫里亞克和亞哈貢推介至文壇，至此開始他文學和語言的雙向思考。他自認所寫小說屬於十八世紀放縱小說傳統，同時展現寫作的內在和社會生活，雖然享譽文壇，但是他在政治判斷上的屢屢失誤和轉向，折損他不少聲名，例如1995年他支持右派的總理巴拉度競選總統。

1960年他與同好共創前衛文學雜誌《如同》（*Tel Que*），最早是宣揚純文學，在先後與法耶（Jean-Pierre Faye）、里卡度（Jean Ricardou）和克莉斯緹娃合作，將方向轉向兩方面：在文學的科學反思方面，索緒爾的符號學、拉岡的心理分析和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都是當時雜誌討論的重點；在政治參與方面，追隨當時的毛主義趨勢。《如同》在1982年停刊，並於次年以《無限》（*L'Infini*）為名復刊。

[2] 巴拉度：法國前右派總理。1993年左派的密特朗任命右派的巴拉度為總理，巴拉度在1995年甚至出馬與其黨主席席拉克敵對進而競選總統，事後也未被開除黨籍而繼續在法國政壇活躍。

- [3] 薩德 (Marquis de Sade, 1740-1814)：十八世紀法國貴族，人稱薩德侯爵，因為放蕩的性行為而惡名昭彰，著有《賈斯汀，或美德的不幸》，《索多瑪 120 天》等，他是情色文學的建立者，施虐狂 (sadism) 一詞即由其名而來。
- [4] 莫理亞克：當代法國小說家，作品中毫無保留表現人物內心深處的顫動，體現對傳統精神的強烈反抗。
- [5] 亞哈貢：法國當代共產黨現實文學作家，作品中塑造共產黨光輝群像，凸顯反映進步力量和反動勢力的激烈鬥爭。

從外國人的地位來測試政黨候選人*

法國所賦予外國人的地位這個問題，並非只是一個「細節」。不幸的是，這個被誤導的問題，在政治鬥爭中所占的分量越來越重要，但卻完全被扭曲。

「競選政見上涉及在法國之外國人的調查小組」
(Groupe d'examen des programmes électoraux sur les

* 這篇文章發表於1995年5月3日的《解放報》，署名作者是Jean-Pierre Alaux和我本人，目的在對GEPEF於1995年3月所做的調查（針對八名總統選舉候選人而做的，目的是要檢驗他們對於法國境內的外國人狀況抱持何種政見，因為在選戰裡幾乎沒有什麼人談到這個議題）提出一個總評價。

étrangers en France, GEPEF) 深信每個政黨候選人對這個問題都應該要清楚表態，因此就做了一個測驗，其測驗結果值得公告於世。候選人紛紛迴避調查小組所提出的問題，只有共產黨的羅伯·余 (Robert Hue)^[1] 及綠黨的瓦娜夫人 (Dominique Voynet)^[2] 除外；瓦娜甚至把這個問題和取消巴斯括 (Pasqua) 法案^[3]、無法驅逐之移民地位的合法化，及保障少數民族權益等等議題，一起做為其競選的主要政見之一。巴拉度的回覆只談及幾個概括性原則。席哈克 (Jacques Chirac)^[4] 不回應我們進行訪談的要求。喬斯潘 (Lionel Jospin)^[5] 授權給歐布里夫人 (Martine Aubry)^[6] 和孔巴德里 (Jean-Christophe Cambadélis)^[7] 去回答，可惜的是，他們兩個一點也沒有讓喬斯潘的立場更清楚。

我們不需要行家就可以發現他們的沉默不語，因為他們也默認那些排外的言論，這些言論把社會上的不幸 (像是失業、青少年犯罪、吸毒等問題) 變成一種仇外的情緒。或許是出於缺乏信心，害怕失去選票，結果他們都閉口不談這個時常被誤導、被刻板化，卻又上不了檯面的問題，只敢觸及「治安問題」、「盡量減少外來

者」的必要性，或控制「地下移民潮」（他們趁機提出人蛇販子的角色，以便顯出開明進步的樣子）。

然而，所有爭取選票的算計中（政界及媒體對民調的趨之若鶩，只會鼓勵這種趨勢），依靠的是一連串沒有根據的成見：像人云亦云、混淆視聽、捕風捉影。例子不勝枚舉，只舉其一：對那些沒有從任何地方**移出**的人，或者我們也稱之為**第二代**的那些人，我們可以稱之為**移民**嗎？同樣地，用**地下**這個形容詞最主要的功能之一（自命正派之士把「地下」和「移民」放在一起），不就是想在思想上及語言上，把人的「偷」（**地下**）渡邊境，等同於槍枝毒品等違禁品的走「私」（**地下**）嗎？犯罪上的混淆，就是要使人把偷渡者視同罪犯。

這些人云亦云的成見，使得政治人物到最後也開始相信選民們都是這麼認為。他們為了穩固票源，不敢得罪**民意**，而他們也事先預設民意是反對**移民**，反對外國人及反對邊境採取任何形式的開放。民調者（現代的算命家）的判決，以及顧問的命令（不問理念和能力），都在慫恿政治人物去努力爭取極右派勒班（Le Pen）^[8]的選票。然而，我只要提出一個論據，一個有力的論據

就夠了：從勒班的選舉結果即可以得知，在執行了將近兩年的巴斯括法案以及加強治安的言論和措施之後，我們越減少境內外國人的權益，反而越使極右派（國家陣線〔Front national〕^[9]）的得票越增加（這當然是有一點簡化的說法，但是說在法國境內推行改善外國人地位的措施，只會造成極右派的選票增加，也是太過簡單了）。總之，可以確定的是，在把極右派的得票全部歸因於排外情緒之前，最好先探究其他的因素，比如說使媒體政界飽受衝擊的貪污醜聞弊案。

話說回來，還是應該要去重新思考外國人在現代民主國家中的地位問題，也就是邊界的問題，目前人民的遷徙自由還是受到限制，然而，在我們現在這個的世界裡，卻可以從人員物資的自由流通中獲益匪淺。短期而言，至少應該要去評估和巴斯括有關的治安政策對國家所造成的成本負擔，即便是從利益的邏輯來看：對以護衛人權為其傳統的法國來說，警察歧視性臨檢（製造或強化**社會分裂**）所帶來的成本，以及對基本權利的侵害及其普遍化所帶來的成本，都應列入考慮。

外國人的地位問題，是一個重要的衡量標準，即所

謂的schibboleth¹，可以用來判斷政黨候選人是否敢站出來反對那個狹隘的、倒退的、保護主義的、保守的、排外的法國，並且支持那個開放的、進步的、國際的、廣博的法國。這也是為什麼公民—選民應該要選擇敢和法國目前有關「接待」外國人的政策明確劃清界限的候選人。這人應該是喬斯潘，但他願意嗎？

巴黎，1995年5月

¹ Schibboleth是可以評價一個人能力的重要測驗。

[1] 羅伯·余：法國共產黨黨魁。

[2] 瓦娜夫人：前法國環境部部長，綠黨黨魁。

[3] 巴斯括法案：緊縮移民政策的法案。

[4] 席哈克：法國現任總統，屬中間偏右派的「共和聯盟」(RPR)。在2002年5月5日法國總統大選中獲得82%的選票擊敗對手勒班而順利當選，得票率之高打破歷屆法國總統大選記錄。

[5] 喬斯潘：原法國總理及社會黨黨魁，於2002年法國總統大選第一輪意外落敗之後，宣布退出政壇。

[6] 歐布里夫人：法國當時的職業與社會服務部部長。

[7] 孔巴德里：法國社會黨全國聯盟秘書。

[8] 勒班：現年73歲的勒班樂於標榜自己是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老兵，1972年創辦「國民陣線」以來，個人色彩鮮明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路線，反猶太人、反移民、反歐盟一體化建設是他一貫主

防火牆

張，「法國和法國人優先」則是他的主要口號。在法國政壇上他被視為挑動種族主義仇恨的爭議人物，經常發表極右的挑釁言論、崇尚納粹法西斯的理念，使他容易脫口說出如「納粹德國製造的大屠殺是歷史細節」的話語，引來整個社會的嚴厲批判。歐洲的左派人士也早就將他和「法西斯」畫上等號，不過，他對法國社會問題的分析卻有逼近事實的見解，令許多對其理念不敢恭維的知識分子也樂於以嘲諷的態度聽聽另一種聲音。

1974年勒班第一次參加競選總統，得票甚微，1995年再度出馬，竟已獲得15%的選票，2002年法國總統大選，勒班在第一輪選舉就打敗社會黨總統候選人喬斯潘，成為第二輪總統選舉候選人，這個法國政治大地震也掀起全法反極右派勢力的運動熱潮。

- [9] 國民陣線：法國極右思潮發跡於第三共和時期，因曾與納粹合作並具法西斯傾向，還曾反戴高樂總統，所以一直遭到排斥。即使1972年勒班重組極右組織為國民陣線，還是未受選民重視。不過，隨著左派在八〇年代初執政，也和右派一樣無法有效解決國內經濟不景氣及失業等問題，國民陣線乘勢鼓吹民粹主義、排外主義和種族主義。失業青年、中小工商業主和手工藝業者及中下階層教育程度低者都是國民陣線的支持者。1995年8月地方選舉中，國民陣線獲得南方三個重要城市的控制權，讓法國社會越來越擔憂其迅速發展趨勢，但是隱而不彰的社會問題如治安問題也越被凸顯。1998年國民陣線內部分裂為二，支持者卻有增無減，2002年終於突破歷史在總統選舉中首次有候選人進入第二輪的競賽。

藉理性之名行濫權之實*

[...] 在面對西方虛假的普遍主義時，有一個由回教國家內部由衷發出的重大疑問，也就是我所謂的普遍帝國主義的問題¹。法國曾經是這個帝國主義的最佳代表，而且在這裡，在這同樣的國家裡，這種帝國主義曾導致一種國家民粹主義，對我而言，這個名詞是和赫德（Herder）之名是聯繫在一起的。如果有些普遍主義真的只不過是一種標舉「普遍性」（如人權等等）以便讓人接受的民族主義，那麼要把所有反抗它的基本教義派反

* 這篇文章是在作家國際會議為法蘭克福書展所辦的一場公眾討論時所做的發言，時間是1995年10月15日。

應指責為反動，就沒有那麼容易。科學主義的理性主義（影響國際貨幣基金或世界銀行政策的數學模式，律師事務所，將美國法律傳統強行施加到全世界的大型跨國法律公司，理性行動的理論等等），是一種西方傲慢的表現及保證，這種態度造成某些人好像壟斷了理性，可以把自己當做世界的警察（像我們一般所說的），也就是說，自我宣稱是合法暴力的壟斷者，能使武力為普遍的司法正義而服務。恐怖分子的暴力（幾乎總是透過其所根植的絕望之非理性主義而來），是回應於引用理性之權力的遲鈍暴力。經濟強制力時常用司法理性來裝扮自己。

帝國主義則躲在國際機構的合法性之後。理性化（目標在掩蓋其雙重標準）的虛偽性，在阿拉伯人民、南美洲人民及非洲人民之間，只會造成對理性的強烈反抗，而這一反抗，可以說是導因於我們的藉理性之名（經濟的理性或科學的理性，或其他）行濫權之實。這些非理性主義一部分來自於我們的理性主義，我們氾濫的、征服的，或平庸的、狹隘的、沒有安全感的、倒退的、壓制的帝國主義（依時間場合而不同）。所以，對

抗那些藉理性之名行濫權之實的人，仍是在護衛理性。

法蘭克福，1995年10月

- ¹ P. Bourdieu, «Deux impérialismes de l'universel», in C. Fauré et T. Bishop (éds), *L'Amérique des Français*, Paris, Éd. François Bourin, 1992, pp. 149-155.

鐵路員工的真話*

10月17日星期二，一輛巴黎區間火車（RER）的第二節車廂突然發生一起爆炸案，駕駛這列火車的一名鐵路員工，非常冷靜地疏散乘客之後，提醒大家不要把罪怪在阿爾及利亞社區的頭上：他淡淡地說，阿爾及利亞裔也只不過是一些「像我們一樣的人」罷了。

這段非比尋常的話，如同法國思想家巴斯卡（Pascal）所謂的「健康人民之真理」，一下子打破一般政客有意無意歸諸於人民的那些充滿排外情緒的種族主

* 這篇文章發表在1995年11月的《另類阿爾及利亞》（*Alternatives algériennes*）。

義言論，實際上，正是這些政客在製造種族主義言論並推波助瀾，但他們卻自以為是在替那些所謂單純的人民設想，替他們說出他們最單純的想法，甚至以為這就是人民所要的。或者，這些政客挾著看似民主的收視率或民意調查而自重，來強迫人民接受他們無恥而粗暴的種族主義言論。

鐵路員工這段話，證明了人民可以抵擋廣播電視報紙等大眾媒體的語言暴力，這些媒體每天毫不以為恥地，透過反覆的言論、平庸化的影像和習以為常的話語，讓人民對語言的暴力從習慣到上癮，並且不知不覺地越來越放縱種族主義惡言的肆虐，降低對種族主義成見及混淆視聽之亂語的批判力（例如將回教和回教主義運動，回教徒和回教運動者，或回教運動者和恐怖分子混為一談），陰險地強化上個世紀遺留下來的殖民主義思想和行為。如果我們仔細分析最近讓法國內政部十分滿意的臨檢，我們可以由警察所執行的1,850,000次臨檢中的一段，看出在我們這個曾以對外國人開放而聞名的國家裡，其中一部分的公民或外來客，竟然必須忍受不可勝數的羞辱（如被直稱「你」而非「您」、當眾搜身

等)，以及不公平待遇和現行犯罪之侵害（施暴、破門而入、隱私權的被破壞）；從這些侵害行為所引起的憤恨、反抗或狂怒，也可以看出：部長們原本要用來安撫或滿足國家安全的排外訴求，一時之間也變得不是那麼令人心安。

鐵路員工的這段話，鼓勵我們更堅決地對抗那些只想便宜行事的人，這些人扭曲複雜的歷史事實，把歷史簡化成簡單而令人心安的善惡二元論，而這種二元論，也是把理性辯論當成一場摔角賽來看的電視媒體所建構出來的模式。只是簡單地表態贊成或反對一個想法、一個價值、一個人、一個制度或一個狀況，總是比從事實上去分析它，多角度地來看它到底是什麼，來得容易的多。人們對記者所謂的社會問題，越是無能去分析和了解，越會急著去表態，尤其當這些問題與一般民族自我中心的直覺判斷相衝突時，比如說回教面紗¹¹的問題。

歷史事實總是高深莫測，很難光從外表來解釋。對於阿爾及利亞的問題，其複雜度之高使其更是難解。也因此，不管從認知或行動上，這個問題的解決，代表的是一個十分特殊的挑戰：阿爾及利亞的問題不但是真理

的分析方式之檢驗，也是所有政治參與的試金石。

特別是這個案例，嚴謹的狀況分析及制度分析，會是對抗偏見和善惡二元論最有效的良藥，尤其是和這些成見相輔相成、為討好而附和眾人的「共同體」意識；而此意識透過其所產生的象徵（意識形態）和所使用的言詞，常常會替人類社會帶來難以承受的嚴重後果。

巴黎，1995年11月

[1] 1989年新回教徒移民的女兒們，因戴頭巾上課而被公立學校驅逐，論戰結束後，當時的教育部長喬斯潘正式批准可戴頭巾上課，這個問題在95年又重新被媒體炒作。

抵擋一個文明的破壞*

我要在此表達我們對那些戰鬥者的支持，他們這三個禮拜以來，奮力對抗一個文明的破壞，而這個文明，牽涉到公部門（公共福利）^[2]、平等權利、教育權、健康、文化、研究、藝術，特別是工作權的存在。

我在此想說的是，我們完全了解這個深刻的運動，了解它想表達的絕望和希望，我們完全能感同身受；我們所不解的是（或太了解的是），那些不了解這個運動的人，比方說出現在12月10日《週日新聞》（*Journal du*

* 這篇文章是在1995年12月的大罷工^[1]期間，在巴黎里昂火車站所做的發言。

dimanche) 節目裡的那位哲學家，他說他非常訝異地發現，由朱沛 (Juppé, 法國當時的總理) 所代表的那種對世界合乎理性的理解——他一字不漏清楚地說出——和那些人的深切欲望竟然會是如此天差地別。

這種把開明「菁英」的遠見和人民 (及其代表) 的衝動短視相對立的想法，其實是每個時代每個國家都有的典型反動思想，只是今天它換上了一種新的面貌，而國家的貴族，則是藉由文憑及科學權威 (特別是經濟學的) 獲取自身合法性的自信：對這些神權的統治新貴而言，不只是理性和現代，還包括運動和變革，都是站在當權者、部會首長、老闆或「專家」這邊；而不理性和落伍，遲鈍和保守，才是屬於人民、工會及批判的知識分子。

朱沛所表現出來的，正是這種技術官僚的堅信，他大聲疾呼：「我要法國成為一個認真而快樂的國家。」意思是說：「我要那些認真的人，也就是說，菁英各國立行政學校^[3]出身的人，那些知道人民幸福在何處的人，能夠為人民帶來幸福，即使人民不願意，也就是說，即便是違反人民的意志；事實上，人民乃為其欲望

所蒙蔽，正如那個哲學家所說的，所以人民不識其幸福，特別是被那些比人民更了解人民自身幸福的人（像朱沛）所管理的幸福。」這就是技術官僚所想的，及他們所了解的民主。所以我們可以了解為什麼他們無法理解人民要上街頭反抗他們。（多麼忘恩負義！）

這些國家貴族，鼓吹國家的終結及市場邏輯的全權宰制（用消費者取代公民），甚至掠奪了國家：他們把公共財變成私有財，公共事務變成其囊中物。今天，事關重大的是，民主對技術官僚的反攻：我們必須要和專家的專制做個了結，像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這類的專家，毫無餘地地強制我們接受新怪獸（財經市場）的判決，不願協商只想「說明」；我們必須打破自由主義理論家們所宣傳的歷史必然性；我們必須要創造集體政治運作的新形式，使之能把各種必要性，特別是經濟必要性（這可以是專家的的工作）列入考量，以便克服甚至瓦解這些必要性。

今天的危機也是一個歷史的轉機，不但是在法國，在歐洲及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有越來越多人不接受自由主義或不文明這種新的二擇一。鐵路員工、郵務員、教

師、公部門職員、學生，以及其他或多或少參與運動的許許多多人，透過他們的示威遊行、宣言以及他們所引發的連媒體都無法遮蓋的反省聲浪，提出了幾個最根本的大問題，這些問題是不能交給那些自負又無能的技術官僚去處理，這些問題包括：如何為首要當事人（即我們每一個人）對公部門（健康、教育、交通等等）的未來重新建構一個既明智又合理的定義，特別是和歐洲其他也面臨同樣威脅的國家保持密切互動？如何重新創建公立學校（在高等教育這個層級上），拒絕逐漸走向兩套教育體制（名校和學院的對立）？在教育上及交通上，我們也可以問同樣的問題。如何對抗公部門人員工作的不穩定性？因為這只會造成依賴和屈服，對文化教育傳播事業的發展尤其不利？

對於公部門的重新建構，知識分子、作家、藝術家、學者等等都有一定的角色可扮演。首先他們可以幫忙打破技術官僚對傳播工具的壟斷。但他們也可以有組織地、長期性地去支援（而不只是在發生危機時才偶爾碰面）那些能有效引導社會未來的團體，特別是協會和工會，並且對主流媒體的打壓這個大問題做出嚴謹的分

析及具建設性的提議：我想到的特別是有關世界經濟場域整合及新的世界分工所帶來的社經影響這個大問題；或者是所謂的財經市場鐵律這個問題，有多少政治創舉是在它的大蠱之下遭到犧牲；以及在以資訊為主要生產力的經濟形態裡，教育及文化該發揮什麼樣的功能這類問題等等。

這些聽起來十分抽象，而且好像是純就理論著眼。但是我們可以否認專制的技術官僚主義，卻也不至於陷入某種民粹主義，因為過去的社會運動太常走向民粹主義，而這只會再次讓技術官僚從中獲利。

總之，我想表達的是（原諒我因拙於表達，而冒犯或困擾了某些人），我真心想和那些社會改造者站在一起的立場：事實上我認為，要有效地對抗技術官僚（國家的或國際的），只能從他們的強勢之處下手，特別是科學和經濟這兩處，藉著反對他們那種抽象而片段的知識，來凸顯出一種較有人性及較符合人所面臨之現實的知識。

巴黎，1995年12月

- [1] 1995年右派總理朱沛執政，針對繁沉的行政及整個社會福利系統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面對歐盟有關財政赤字的壓力，政府宣布要現代化國家機器，並改革社會保險制度，限制工人領取退休金資格，特別是提高國鐵工人的退休年齡，延長工作時間等。11月15日朱沛在國會提出改革方案，卻遭到公營部門和運輸工人自24日起發動罷工。近一個月的大眾運輸系統罷工癱瘓了整個巴黎，朱沛拒絕工會的「談判」要求，寒風中行走的公眾則無怨言的表示同情支持，直到聖誕節前夕社會高峰會議落幕。這個對抗當權者的社會運動雖然促使朱沛下台，但是後來執政的左派喬斯潘政府卻延襲不少朱沛的改革方案。

這個大罷工所引發嚴重的社會危機一方面延長了法國國家機器的現代化，另一方面闡明了在罷工者維護公務員特殊退休制度的所有要求之上，公共職能特殊的社會性，是所有改革政策都需面對的嚴酷事實。

- [2] 公部門（公共福利）、私部門：一般而言，公部門係指與管理國家、政府及社區事務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所有組織和機構，包括政府組織和主要仰賴於政府或政府主導之外圍組織，旨在提供例如大眾公共事業之有形服務和產品，以及包括諸如教育、社會公平、社會秩序、生活品質、安全、科學基礎、規則及福祉等無形的服務。私部門則指所有在市場中參與經濟活動的私人組織和機構，因此私部門的生產亦包含有形的商品（例如製造業）和無形之商貿服務（例如金融服務業）。
- [3] 在法國，高等專業學校（Grandes écoles）的畢業學生都是國家的菁英人才，這類學院以專門培養國家行政、教育、商業、軍事等菁英為主要宗旨，入學條件和考試非常嚴格，一般高中生要念完兩年預備班，再經過嚴格激烈的競試才能入學。法國社會較重視高等專業學校的文憑，出自此系統的學生地位也遠比一般大學生高，「大學

一研究所」系統儘管歷史悠久且聲名卓著，但只是法國學生的第二選擇。

高等專業學校以專業學院分類，例如高等政治學校、國家行政學校、高等師範學校、高等商業學校等。國立行政學院因為是專門培養統治國家機器的國家高級公務人員，國家元首、部會首長大都出身於此系統，所以也是高等專業學校中的翹首。不過，學生的社會來源根本無法體現法國社會階層的分布，連招生方式也越來越封閉，其父親為高層管理人員或從事自由業的比例在八〇年代初期為65%，而1994年參加考試的男性中，則高達76%，工人家庭子女的比例則僅有3.6%。

全球化的迷思及歐洲社會福利國家*

不管在哪裡，我們都會聽到有人說，新自由主義^[1]的觀點沒什麼好反對的，因為它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而且我們也別無選擇——正是這一說法使得主流的自由主義言論得以大行其道。新自由主義之所以顯而易見無庸置疑，是因為在消極面，有記者們或一般公民，在積極面，有一些知識分子，不斷地在灌輸這種想法。為了防止這種持續且暗中的洗腦（透過潛移默化而成為

* 這篇文章是在雅典為希臘勞動者總聯盟（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es travailleurs grecs, GSEE）所做的發言，時間是1996年10月。

一種牢固的信仰)，我認為研究者有一定的角色可以扮演。首先，他們可以去分析這種言論是如何產生、如何傳播出去的。在英國、美國和法國，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詳細地描述這種自由主義的看法是如何被生產、傳播及灌輸。透過一連串對有關自由主義的文章內容及報章雜誌的分析，從其如何成為主流言論，其自由主義作者們的特性，以及他們所召開的會議（以便製造更多自由主義言論）等等來下手，這些在英國及法國的研究顯示出，某些知識分子、記者和工商業者是如何把新自由主義的觀點灌輸成一種想當然爾、天經地義的看法，而這種看法，其實只不過是把每個國家每一時期的保守思想裡最傳統、最老掉牙的假設，重新披上經濟合理化的包裝。我這裡想到的是對《證據》（*Preuves*）這本雜誌之角色所做的一個研究。這本雜誌在CIA（美國中央情報局）出資及一些法國重量級知識分子的贊助下，花了二十到二十五年的時間（要使一個錯誤的思想成為自明之理，本來就需要一段漫長的時間），不斷地製造這些逐漸成為所謂明顯事實的自由主義想法（儘管這些想法一開始是反潮流而行）。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英國，柴契

爾主義不是柴契爾夫人時代才開始的。老早就有一群又一群的知識分子（大部分是在大報紙上擁有言論影響力的人）在為柴契爾主義鋪路。研究者第一個可能的貢獻，就是用大家都能理解的形式，去傳播這些研究分析的結果。

對自由主義的灌輸，很早就開始，一直到今天仍持續不衰。到現在還常常可以看到每隔幾天，就會有關於美國或英國經濟奇蹟的報導，奇蹟式地出現在法國所有的新聞媒體上（隨著每家媒體在新聞界的立場不同而有不同的版本）。在新聞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很大一部分是無意識之中所為，因為大部分的人只不過是誠實地重複這些想法），這種一點一滴的灌輸，可以產生很深刻的效果。也因此，到最後，新自由主義思想變得像是一種**不可避免的事實**。

他們將下面這些預設，灌輸成一種理所當然的事實：人類行動最終及唯一的目標，是達到最高的（經濟）成長率，也就是說最佳的生產力及競爭力；沒有人可以抵擋經濟的力量；經濟所有的預設基礎，在於社會與經濟的截然二分，而社會則被視如敝屣地丟給社會學者。

另外一些重要的自由主義預設，就是那些大舉入侵我們生活的日常詞彙，只要我們一打開報紙或收音機，就得接受這些詞彙的污染，雖然他們也是經過層層掩蓋。可惜的是，我手邊沒有希臘的例子，但我想你們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實例。我舉法國的例子來說，現在我們已經不說資方這個詞了，而是說「國家生命力」；我們不說解雇，而是說「企業瘦身」，這裡用的是運動的比喻——身強體健者不能太胖。當一個企業要資遣兩千名員工，我們會說那是某公司勇敢的「社會計畫」。還有一連串的意含及字串，像彈性、靈活性、自由化等，這些字眼讓我們以為新自由主義的觀念是放諸四海皆準的解放思潮。

為了抵抗這些自由主義的臆斷，我認為應該要去分析它們，並且試著了解其生產及灌輸的機製。雖然這很重要，但光這麼做還是不夠，一些實證經驗可以凸顯這一點。拿法國的例子來說，我們可以看到國家開始放棄某些社會領域的介入，結果是各種社會問題的爆發，影響所及，不只是那些原本就貧窮的人受到打擊。在這裡，我們可以明白地指出，大城市郊區種種社會問題的

根源，正是由一個新自由主義的住宅政策（七〇年代開始施行，所謂的「個人式協助」^[2]）所造成，這個政策使得社會被隔離成一邊是大部分由移民所組成的次普羅階級，他們只能留在國民住宅裡；另外一邊則是擁有一份固定薪水的工作者及小資產階級，他們搬去自己買的獨棟式小房子，而且受制於沉重的房貸負擔。這種社會的鴻溝是政策措施所造成的。

在美國，我們可以看到國家被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為特權者提供社會保險的國家，這些特權者在國家所提供的足夠擔保下，可以反過來提供更多的擔保；另一部分是一個壓制人民的警察國家。加州是美國最富有但也最保守的州之一（有一段時間，加州曾經被某些法國的社會學者視為所有自由解放運動的天堂），擁有可能是有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學，但從1994年以來，它的監獄預算就已經超過它所有大學預算的總和。同樣地，芝加哥黑人社區所認知的國家，是由警察、法官、典獄長和保釋官（也就是那些他們必須定期報到，否則就得去坐牢的懲罰執行官員）所構成。這是一種統治者夢寐以求的世界，國家縮小到只剩下警察功能，就像華克康

(Loïc Wacquant) ^[3]所指出的那樣。

我們在美國所看到的，在歐洲也開始略見端倪，然而卻是一種**退化**的過程。當我們在研究國家從社會中誕生的過程時，在國家機器最早形成的那幾個社會，像法國及英國，我們最先看到的是一種武力及經濟力的集中——二者相輔相成，因為要有錢才能打仗及鎮壓等等，但也需要警力才能徵收財物。然後有文化資本的集中，接著才是權威的集中。這個國家機器隨著其進展，逐漸獲得自主性，成為部分獨立於統治者的一股社會經濟力量。國家官僚體制開始有能力扭曲及詮釋統治者的意願，有時甚至能影響政策。

我們可以從國家機器退化的過程看到，在國家傳統越強的地方，反抗新自由主義信仰及政治的力量也就越強。這是因為國家以兩種方式存在：在客觀的現實裡，國家指的是所有諸如條例規則、局室或部會等的機關制度，但國家也同時存在於我們的腦袋裡。例如，在住宅補助政策進行改革時，法國官僚內部的社會事務部會便為了護衛住宅的社會政策，而與財政部會相對抗。這些公務員致力於護衛他們的部會及其立場；但這也是因為

他們相信他們的部會，他們只是在護衛他們的信仰。不管在哪個地方，就某種程度上來說，國家都是社會在經過抗爭之後於現實中所留下來的痕跡。例如勞動部是經過社會抗爭後才成為一個存在的事實，即便在某些狀況下，勞動部也可能會變成一種鎮壓人民的工具。而國家也以主觀權利的形式或對「社會權益」(les acquis sociaux)的要求，而存在於勞動者的腦袋裡（「這是我的權利」、「你們沒有權利對我這麼做」）。例如，法國和英國這兩個國家最大的不同點之一，在於受柴契爾主義影響的英國人並沒有去強力抗爭，而這點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英國的工作合約只是習慣法下的一個合約，而不像在法國是受到國家保障的一個條約。矛盾的是，當我們今天還在歐洲大陸讚揚英國模式的時候，英國工人也轉向歐洲大陸，發現歐洲大陸提供了那些英國自己的工人傳統所沒有提供的東西，也就是工作權的概念。

國家是一個模糊而曖昧的現實。我們不能只滿足於「國家是統治者的工具」這一說法。毫無疑問的，國家並非完全地中立，也並非完全地獨立於統治者，但是國家越古老強大，國家結構中從社會抗爭爭取來的部分就

越是重要，國家的自主性也就越強。國家是衝突的所在地（例如提供財務支助的財經部門和負責社會問題的預算支出部門間的衝突）。為了抵抗**國家的退化**，也就是說防止國家退化成刑罰的國家，或者說變成只會鎮壓，而犧牲其他社會功能（教育、健康、救濟等）的國家，社會運動可以從負責社會問題的政府部會中獲得有力的支持，像協助長期失業者的政策負責人，他們會去擔心社會凝聚力的斷裂及失業問題等等，他們與財政部會是對立的，因為後者只看到全球化的強制力量及法國在世界中的位置。

我剛才提到「全球化」：用一個比較強烈的說法，我認為全球化是一個迷思，一個強勢的言論，一個力量的概念，一個擁有社會力及讓人信仰的概念。全球化是對抗福利國家之社會權益的主要武器：我們說歐洲的勞動者必須和世界其他地方較不幸的勞動者競爭。我們提供給歐洲勞動者的模範，是那些連最低工資都不存在的國家，那些國家的工人每天要工作十二個小時，但是薪水只有歐洲工人的四分之一到十五分之一，他們也沒有工會，甚至還雇用童工等等。正是藉著這樣的一個模

式，人們要我們接受所謂的「彈性」（自由主義的另一個關鍵字），也就是說，要我們夜間工作，周末工作，接受不規律的工作時間等等，這些一直都是企業老闆的美夢。我們可以說，新自由主義在時髦現代的包裝下，隱藏的是資方最古老的想法。（美國的一些雜誌，甚至依照這些打前鋒的企業老闆膽敢解雇的員工人數，選出優勝排行榜。）這正是**保守革命**的特性，德國三〇年代的革命、柴契爾夫人的革命、雷根以及其他等人的革命，其實都是把復辟當成革命。今天的保守革命又有了新面貌：他們不再像以前一樣，藉著讚美土地和血緣這一古老的農業神話，來抒發對一個美好的過去之思念。新型式的保守革命倚靠的是進步、理性及科學之名（指的是經濟），來合理化復辟，並且把真正進步的思想和行動貼上過時的標籤。保守革命把所有的實踐（這裡指的實踐，是那些任由市場邏輯或強者邏輯的經濟領域實際運作之規則）建構成理想的典範。保守革命認可及讚美我們所謂的金融市場的宰制，也就是說，回到一種徹底的資本主義，在那裡只存在一種法則，即追求最大利益的法則，一種赤裸裸、不受任何約束的資本主義，但

是利用現代化的支配模式（像企業管理學）及操縱技巧（像市場調查、企畫、商業廣告），來合理化及極大化經濟效益的追求。

如果這種保守革命真的欺騙得了人，那是因為表面上它一點也沒有三〇年代德國黑森林保守革命分子的鄉土氣息^[4]；今天它是戴著現代化的面具而來。保守革命不是來自芝加哥^[5]嗎？伽立略說過，自然界是用數學的語言寫出來的。今天，人們要你相信經濟社會是處於均衡式。新自由主義以數學為武器，而成為保守的社會正統論之最終形式，而這個正統論三十年以來，就一直在宣告「意識形態的終結」，最近甚至喊出「歷史的終結」。

為了對抗「全球化」的迷思（全球化的主要目的，是要我們接受某種復辟，也就是回到野蠻無恥的資本主義形式——雖然是被合理化的），必須先回到事實。如果我們去看統計數字，就可以發現歐洲勞動者所面對的競爭壓力，主要是來自歐洲內部。根據我所有的資料來源顯示，歐洲國家70%的經濟交流是在其他歐洲國家之間進行的。強調歐洲以外的競爭壓力，等於是掩蓋了歐

洲國家之間的競爭關係，而這才是歐洲國家的主要危險，也就是我們所稱的**社會傾銷**（social dumping）：社會保護不足、薪資低的歐洲國家，可以從競爭中獲利，但是也把其他歐洲國家往下拉，逼迫其他歐洲國家放棄社會權益以維持競爭力。這意味著，如果要避免這種惡性循環，歐洲較先進國家的勞動者必須聯合較落後國家的勞動者，以維護他們的社會權益，並且使得這些社會權益也能普及到所有的歐洲勞動者身上。（這並不是那麼容易，因為每個國家的傳統不同，狀況也不一樣，特別是相對於國家的工會力量，以及社會保險資金提供的模式，會隨著國家而不同。）

但這還不是全部的事實。還有那些每個人都可以察覺到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種種效果。就此，有一些英國的研究調查指出，柴契爾夫人的政策導致了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一種貧窮感，先是發生在體力勞動者身上，然後傳到小資產階級裡。我們發現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美國，那裡的工作越來越不穩定，低收入者越來越多（這些卻造成低失業率的假象）。美國的中產階級，處於隨時會被解雇的威脅下，感受到強烈的不安全感（我們

這才發現到，在一個職位當中，重要的不只是它所帶來的工作和薪水，還有它所帶來的安全感)。在所有的國家裡我們都可以發現，比起固定勞動者，臨時雇用的勞動者所占的比例越來越高。工作的不穩定性及彈性化導致小優惠的喪失，這些常被描述成有錢人的特權之優惠，本來可以用來彌補工資的微薄、類似固定工作者所有的健康保險及退休保險。另一方面，私有化則導致集體社會權益（社會保險）的喪失。例如，以法國的例子來說，四分之三新雇用的勞動者是以臨時雇員的名義雇用，其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會成為固定勞動者。當然，新雇用者大部分都是年輕人。因此在法國，主要是年輕人最受不安全感打擊——我們在我另外一本書《世界的悲慘》（*La Misère du monde*）裡同樣地也可以發現這一現象——但在英國也是如此，英國年輕人的貧困已經達到極點，這也導致犯罪行為及其他社會代價昂貴之社會問題。

在今天，還要再加上對人類稀有文化資產的社會經濟基礎之破壞。透過作家、藝術家及學者的努力與犧牲而換取的文化生產領域之自主性，在面對市場邏輯的不

斷擴張之下，卻越來越受到威脅。商業的支配一天比一天更強勢地滲透到文學領域裡，特別是透過出版社的合併，使得出版社越來越受制於立即利潤的回收。同時這個商業支配也介入文學藝術批評領域，使得批評自甘成為編輯投機的奴僕，或成為編輯的狐群狗黨，相互利益輸送，商業的支配尤其在電影這一領域中大行其道（我們不禁懷疑，如果不提供給那些前衛製作人生產、特別是發行的管道及資金，十年後，歐洲電影還會剩下些什麼）；這裡還不說社會科學，被迫不是屈服於國家或企業官僚有利害關係的委託，就是在權力（和機會主義者輪替稱霸）或金錢的刀口下夭折。

如果全球化歸根結柢只不過是一個（為保守者）辯解的迷思，那麼在一種狀況裡，全球化是真實存在的，那就是金融市場的全球化。藉著司法控制的減低、現代溝通管道的改善（使得溝通成本下降），我們逐漸走向一個統一的金融市場，但這並不意味著這是一個均質平等的市場。這個金融市場是由某些經濟體所控制，也就是那些最有錢的國家，特別是那些國幣被拿來當做國際準備貨幣的國家，他們因此可以在金融市場裡擁有更大

的自由度。金融市場是一個場域，於其中，統治者，特別是美國，所占據的位置使他們可以決定大部分的遊戲規則。這個金融市場的統一，圍繞著占統治地位的幾個國家，造成各國自己的金融市場自主性之降低。在法國，那些告訴我們要服從必要性的金融家及金檢人員，忘了告訴我們，他們其實是這個必要性的共謀，而且是透過他們，法國國家才讓出其權力。

簡而言之，全球化並不是一種均質化的過程，反而是少數幾個宰制國家將其影響力擴張到所有國家金融市場裡的過程。由此而來的是，部分國際分工的重新定義，而歐洲勞動者也必須承受新的國際分工之後果（例如，資金和企業移轉到勞動力廉價的國家）。這個國際資金市場會減低國內資金市場的自主性，特別是使得國家再也不能操控匯率及利率，而這些利率的決定權也逐漸掌握在少數幾個國家的手裡。國家權力只能任由擁有大量資金的投機金融作手之肆虐，這些金融作手可以導致貶值，而因為金融市場對左派的政府疑心重重，使得左派的政府特別受其威脅（一個右派政府的政策就算不符合國際貨幣基金的理想，其所受到的威脅仍遠遠小於

一個左派政府，即便其政策是符合國際貨幣基金之理想)。這是因為世界場域的結構產生結構性的限制，使得整個機製看起來像是不可避免的。某一個國家的政策，大大地受制於它在金融資本分配結構中的位置（而金融資本的分配又決定了世界經濟場域結構）。

面對這些機製，我們該怎麼辦？首先，要去思考經濟理論暗含的局限性。經濟理論在評估一個政策的成本時，並不考慮我們所謂的社會成本。例如，法國總統季斯卡在1970年所決定的一個住宅政策，隱含長期的社會成本，但是除了社會學者，沒有人會覺得那是一種成本，因為二十年後，誰還會記得這個政策？誰會把1990年發生在里昂郊區的一個暴動，和1970年的一個政策決定聯想在一起？罪首並沒有受到懲罰，因為沒有人記得他們。所以必須要有整個社會的批判力量之堅持到底，才能把經濟決定所造成的社會成本，納入經濟計算中。從長期來看，解雇、苦難、疾病、自殺、酗酒、吸毒、家庭暴力等等，到底花了社會多少成本？它們之所以成本昂貴，不只是金錢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痛苦）。即使看起來有點無恥，我認為對主流的經濟應該以其人

之道反治其人之身，而且要提醒大家，即便是在了然的利益邏輯之下，純粹經濟的政策也不必然是省錢的（符合經濟效益的），生命財產上的不安全感也要納入考量，也就是指治安上的花費等等。更詳細地來說，必須徹底質疑把一切（不管是生產，還是正義或健康，成本還是獲利）都個人化的經濟觀點，這種經濟觀點忘記了效率（在其狹隘而抽象的定義下，變成只是金錢上的贏利）取決於目標（先有目標才能衡量效率，而不是一味追求效率，忘記原先的目標），這個目標可能是贏利（對投資者及股東而言），但也可能是顧客及使用者的滿意度，或更廣泛地來說，是生產者、消費者的接受及滿意度，或與我們越來越接近，人數也越來越龐大的目標。相對於狹隘及短視的經濟，我們提出的是一種**幸福的經濟**，這種經濟注意到與職業活動有關之集體及個人、物質及象徵（像安全）的所有利益，但也注意到與缺少職業活動或就業不穩定性有關的所有物質及象徵成本（例如藥物的使用，法國是鎮靜劑使用最多的國家）。我們無法欺騙**暴力守恆法則**：所有的暴力都要付出代價，例如金融市場的結構性暴力，不管是以解雇的

形式或以就業不穩定化的方式而為，長期看來，必然會有以自殺、犯罪、違法、吸毒、酗酒，以及日常生活中或嚴重或輕微的暴力形式的反撲。

以目前的狀況來說，知識分子及工會組織等的決定性鬥爭，必須以防止國家的消亡為優先考量。民族國家被金融勢力從外削弱，從內被金融勢力的同謀者（也就是那些金融家、財經高官等）削弱。我認為被統治者應該要護衛國家，特別是護衛國家的社會面向。這種對國家的護衛並不是一種民族主義。而我們之所以反抗狹隘的民族國家，是為了捍衛國家所執行的普遍功能，或者最好是能有一個超國家來執行那些普遍功能。如果我們不希望是德國中央銀行透過利率的調整來管理各國的財經政策，那是不是應該要努力去建構一個超國家，使其或多或少獨立於國際經濟勢力及各國政治勢力之外，而且能夠發展歐洲制度的社會面向？例如，只有當以縮短工時為目標的政策能被歐洲決策當局所採納，並且適用於所有歐洲國家時，才能發揮其所應有的效力。

從歷史上來看，國家曾經是一個合理化的力量，但是這個力量卻被拿去給統治勢力使用。為了避免發生這

種狀況，光靠反抗布魯塞爾那些技術官僚是不夠的。必須要創造一個新的國際主義，至少是在歐洲地區這個層次上，以便使我們在倒退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利用危機而壯大，或多或少威脅著歐洲各國）以外，還能有其他的選擇。也就是要去建構制度，使其能控制金融市場的力量，而且能夠引進一種德國人所謂的Regreziionsverbot——在歐洲層次上有關那些被爭取到的社會權益之禁止往後倒退原則。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工會必須要在這個超國家的層次上行動，因為工會要對抗的力量，正是從這個層次上施力的。所以要試著去建立一個真正的國際主義之組織基礎，使其能對抗新自由主義。

最後一點。為什麼知識分子在這裡面的角色，是那麼曖昧不明？我不打算一一列舉——這將會變得太冗長也太殘酷——所有放任不管的形式，或者更糟的、妥協合作的形式。我只想提所謂的現代或後現代哲學家的辯論，當這些汲汲於學院遊戲的哲學家不滿足於放任不管時，就會堅持在口頭上護衛理性或理性對話，或者更糟糕的是，倡議一種後現代版本的「意識形態終結的意識形態」（其實是非常時髦的激進派），不是在大肆譴責意

識形態，就是在虛無地揭發科學。

事實上，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力量，就是倚靠一種新社會演化論（新達爾文主義）：正如我們在哈佛大學所說的，所謂的適者生存，最優秀者、最聰明者必勝（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Becker〕認為，達爾文主義是經濟主體所擁有的理性計算能力之基礎）。在統治者全球化觀點的背後，隱藏一個能力的哲學，也就是說，有能力者才能統治，才有工作，這也意指沒有工作者，是沒有能力的人。有**成功者**也有**失敗者**，也有我所謂的國家貴族，也就是中古世紀的意義下，那些擁有所有貴族特性的人，他們擁有來自教育的權威，或者用他們自己的說法，是來自上天所賦予的聰明才智，雖然我們知道事實上這個聰明才智是社會所分配的，因為資質的不同是社會的不平等所造成的。這個有關天賦異稟的意識形態，正好可以拿來為一種類似於主子和奴僕間的對立關係合理化：一邊是真正的公民，不但有能力，而且擁有稀少而待遇良好的職業，他們可以選擇其雇主（其他人最好的情況，也是被雇主所選上而已），並且在國際就業市場上能獲取高薪之職，是標準的大忙人（我曾經

看過一份英國的研究報告，談到這些瘋狂的領導幹部夫妻，他們從一架飛機跳到另一架飛機繞著地球跑，而他們的薪水高得令人乍舌，可能四個世代都花不完）；然後是另外一邊，一群只能做不穩定的工作或選擇失業的那些人。

韋伯（Max Weber）曾經說過統治者永遠都需要合理化他們特權的一套神話，或者說，一套可以從理論上替他們特權辯護的社會正統論。能力（天賦異稟）正是這套統治者及其他人所接受之社會正統論的核心。在那些被社會排斥者的不幸裡，在那些長期失業者的苦難裡，多了一些過去所沒有的東西。在過去，總是帶點說教意味的英美式意識形態，只是簡單地區分不道德的窮人和值得同情及稱讚的窮人（deserving poor）。現在則除了道德上的辯護，又加上智能上的辯護，或甚至被智能上的辯護所取代。窮人不只是不道德、酗酒的、腐敗的，而且是愚蠢的、不聰明的。在社會的苦難之中，又摻入了一大部分與學校有關的不幸，因為學校不但決定了每個人的社會命運，而且也製造了每個人對這個命運所賦予的自我形象（這一點幫我們解釋了被統治者的消

極性及動員被統治者的困難度)。柏拉圖對人類社會的想像，類似於我們的技術官僚（把人分為哲人、保護人及人民）。這個哲學也隱藏在我們的學校系統裡。這個非常強勢的哲學被每個人深深地內化。為什麼我們會從積極參與的知識分子，轉變成放任不管的知識分子呢？一部分是因為知識分子擁有文化資本，即便他們算是統治者當中的被統治者，他們還是屬於統治者的那一群。這是他們立場曖昧不明及不熱中抗爭的原因之一。他們也隱約地相信這個有關能力的意識形態。當他們站出來反抗之時，正如1933年發生在德國（希特勒崛起之時）的情況¹⁶，也是因為他們認為就他們所有的能力（有文憑擔保）來看，他們並沒有受到應有的待遇。

雅典，1996年10月

¹ P. Grémion, *Preuves, une revue européenne à Paris*, Paris, Julliard, 1989 et *Intelligence de l'anti-communisme, le congrès pour la liberté de la culture à Paris*, Paris, Fayard, 1995.

² K. Dixon, «Les Évangélistes du Marché», *Liber*, 32, septembre 1997, pp. 5-6; C. Pasche et S. Peters, «Les premiers pas de la Société du Mont-Pélerin ou les dessous chics du néolibéralisme», *Les Annuelles* (L'avènement des

sciences sociales comme disciplines académiques), 8, 1997, pp. 191-216.

³ Cf. P. Bourdieu, «Le racisme de l'intelligence», in *Questions de sociologie*, Paris, Éd. de Minuit, 1980, pp. 264-268.

- [1] 新自由主義主張取消對資本的各種限制，使市場有最多的自由和最少的干預，由「看不見的手」來調節，使各國都得到自由貿易的好處。從理論到具體政策，始於1979至1981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與美國總統雷根開始實施自由化、放寬金融管制和私有化政策，使資本在高度工業化國家打破了自1945至1970年代末以來制約資本活動的大部分屏障；柯林頓執政時，更進一步從根本上左右了WTO的形成。

新自由主義試圖透過WTO機製，促使所有商品與資本盡可能在全球暢行無阻，貿易自由發展，各國門戶開放。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葛林斯班與柯林頓政權就是以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來鼓吹、推動WTO的成立。其主張自由市場、自由貿易與全球化的觀點，代表西方跨國公司的利益；尤其是透過WTO來解除外資直接投資他國的限制，對於金融資本發達的強國特別有利。

- [2] 政府幫助民眾免稅貸款買房子。
- [3] 華克康：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教授。
- [4] 1929年經濟危機使德國納粹宣傳必須關閉邊界以抵擋美國資本主義的影響，回到過去鄉土自然的民粹傳統，革命的納粹以黑森林象徵拒絕未來的資本主義而回歸傳統。
- [5] 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經濟學上的芝加哥學派是個泛稱，大概可以看做是與古典學派（Classical School）一脈相承，擁護與倡導市場機製不遺餘力的新古典學派（New Classical School）。
- 三〇年代美國經濟出現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凱因斯（J. M. Keynes）提倡以政府的積極角色挽救經濟的衰頹，一時風起雲湧，從三〇年代至六〇年代凱因斯學派（Keynesian School）一統總體經

濟學說，獨領風騷。到了六〇年代美國經濟陷入停滯膨脹（stagflation），凱因斯學派強調的萬能政府逐漸褪色，重貨幣學派（Monetarism）趁勢而起，轉而強調政策的法則性（rule）與小政府主義，其時的代表人物是諾貝爾桂冠弗利得曼（M. Friedman），其後理性預期學派（Rational Expectation School）興起，將預期因素加入模型，說明政府政策的無效性，改寫總體經濟學；1995年的諾貝爾獎得主盧卡斯（R. Lucas）是代表性人物。從弗利得曼以降直到盧卡斯，他們的學說都和古典學派一樣強調市場機製，貶抑政府角色，後人統稱為新古典學派，而這些因新古典學派的知名學者都在芝加哥大學執教，亦有人稱為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有趣的是，根據統計，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絕大部分在美國，而他們幾乎都出身芝加哥大學，或與其有所淵源，這也許可以看成是另外一種芝加哥學派。

- [6] 1933年希特勒贏得選舉且執政，德國知識分子因為經濟危機而失業，他們失望他們的能力被制度淹沒，因而支持希特勒改變制度的號召。

德國銀行總裁提梅耶^[1]的想法*

我不是想在這裡表現得高人一等。但是社會整合的失敗（雖然我們要求從文化來修復），確實是某種經濟政策最直接的後果。而我們總是期待社會學者去承擔經濟學者所犯的錯誤。所以，我不願只滿足於提出所謂的減輕症狀的治療，而是試著去問醫生可以為病人帶來什麼。事實上，大部分我們所悲歎的社會「疾病」，有可能根本是下藥過猛所造成的。

因此，當我在雅典飛往蘇黎世的客機上念完這篇德

* 這篇文章是為有關「做為文化問題的社會整合」的德法文化交流時所做的發言，1996年10月在德國佛立堡（Fribourg）大學。

國銀行總裁（他被視為德國馬克的守護者）的訪談時，我想藉著我在這麼一個以註解傳統聞名之地的機會，也從註解的角度來分析這篇刊登在10月17日（1996年）《世界報》的文章。

以下是這個「德國馬克的偉大守護者」所說的：「今天，最重要的，是創造有利於持續成長及投資者信心的環境。因此，必須要控制國家預算。」也就是說（下面幾句話說得更清楚），盡快處理掉社會福利國家，以及其所費不貲的社會文化政策，以便讓那些投資者能高枕無憂（他們寧願自己來做文化投資）。我相信這些投資者都喜歡浪漫派音樂、印象派繪畫，而且，就算我對德國銀行總裁一無所知，他應該也會像我們中央銀行的總裁提謝先生（Trichet）一樣，在空閒的時候，會去吟詩作樂，贊助藝文活動。我繼續讀這篇文章的內容：「所以應該要控制國家預算，降低賦稅到長期上可以忍受的程度。」意思是說：將投資者的賦稅減低到他們可以長期忍受的程度，以免打消投資者的意願而使他們將投資轉往他處。我又繼續讀下去：「改革社會保險制度。」也就是說，埋葬**社會福利國家**及其社會保障制

度，因為這些制度會瓦解投資者的信心，並且引起他們合情合理的不信任。事實上，他們堅信他們的經濟權益（這裡指的是他們的資本）——既然我們說社會權益，當然也可以說經濟權益——和勞動者的社會權益不相容，而且這些經濟權益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維護，即便會毀掉未來歐洲大多數公民（那些被我們在1995年12月大罷工時稱之為有權有勢的特權階級）微薄的社會經濟權益。

德國銀行總裁提梅耶（Tietmeyer）確信投資者的社會權益（我的意思是其經濟權益），無法在長久的社會保險制度中倖存下來。因此，必須馬上改革這個制度，因為投資者的經濟權益不能等。而且為了向你們證明我一點也沒有誇張，高明的思想家提梅耶（屬於德國唯心主義的傳統）繼續說到：「所以要控制國家預算，降低賦稅到長期上可以忍受的程度，改革社會保險制度，打破勞動市場的僵化，使新一階段的經濟成長，單靠我們的努力就能再度達成——『我們的努力』說得真妙——只要我們為勞動市場的彈性化而努力。」終於說出了重點。在德國唯心主義大傳統下的提梅耶，給了我們委婉

的雄辯術（現今的財經市場正時興這一套）一個了不起的例子：必須用委婉的說法才能長期維持投資者的信心——而投資者的信心正是所有經濟體制及歐洲未來的開始與結束、基礎及終極目標——同時避免勞動者的不信任或絕望，因為不管如何都必須考慮到這些勞動者，如果我們想要有新階段的成長，必須誘使他們付出為此所需的努力。因為不管怎麼說都需要勞動者的努力，即使提梅耶委婉地以專家的語氣斷言：「要打破勞動市場的僵化，使新一階段的經濟成長，單靠我們努力使勞動市場彈性化，就能再度達成。」雄辯得妙極了，我們可以這麼翻譯：加油！勞動者！一起為對你們要求的彈性化而努力！

《世界報》的記者，並非無動於衷地詢問有關歐元對外平衡匯率，和對美元及日圓的關係等問題；由於擔心影響投資者（這些投資者讀他的報紙，而且是很好的廣告客戶）意願，他反而詢問提梅耶先生在投資者用語所用的幾個關鍵詞，到底是什麼意義：**勞動市場的僵化及勞動市場的彈性化**。如果勞動者也讀像《世界報》一樣嚴肅的報紙，他們馬上會想到：夜間工作、周末工

作、不穩定的工作時間、緊張、壓力的增加等等。我們看到，「在勞動市場上」，可以像形容詞般地使用，而為了要測試提梅耶先生口中的彈性化，我們可能會忍不住提到金融市場的彈性化或僵化。這些字眼用在提梅耶先生的官腔裡，讓我們可以假設，在他的心中，「打破金融市場的僵化」，或「為金融市場的彈性化而努力」，從來都不是問題。這讓我們想到的是，和提梅耶先生（他想要讓我們相信的「如果我們努力」）的「我們」相反，事實上只有勞動者被要求應彈性化，而且近乎敲詐的威脅是只說給勞動者聽的，像下面這句話：「使新一階段的經濟成長，單靠我們努力使勞動市場彈性化，就能再度達成。」說穿了就是：今天就放棄你們的社會權益，這都是為了避免瓦解投資者信心，而且考慮到明天將為**我們**帶來的經濟成長。就像以前戴高樂主義^[2]向勞動者所提出的政治參與政策一樣，當時熟悉這一邏輯的勞動者，曾用這麼一句話來總結這個政策：「你給我你的錶，我給你時間。」

看完這段話，我又重新讀最後一次提梅耶先生所說的那些話：「今天，最重要的，是創造有利於持續成長

及投資者信心的環境。因此，必須要……——注意這個『因此』——必須要控制國家預算，降低賦稅到長期上可以忍受的程度，改革社會保險制度，打破勞動市場的僵化，使新一階段的經濟成長單靠我們的努力就能再度達成。」一篇這麼特殊的文章，之所以不被人注意到，之所以如此短暫地出現在日報裡，是因為它完全落入大部分日報讀者的期待之中。這讓我們開始自問，這種普遍的期待，是如何被製造及傳播的（我不是接收理論的信徒，我認為在談接收之前，至少應該先問這種期待是從何而來）。這種期待是社會的產品，或更確切地說，是政治的產品。提梅耶先生所用的字眼這麼容易就被接受，是因為這些字眼早已到處大行其道。這些字眼出現在每個人的嘴裡，到處都聽得見，就像貨幣一般地流通，使人毫不遲疑地接受，就如同能精確地使用一種貨幣那樣，這當然是穩定而強勢的貨幣，像德國馬克一樣，代表著信心、信仰及信用：「持續的成長」、「投資者的信心」、「國家預算」、「社會保險制度」、「僵化」、「勞動市場」、「彈性」，還要再加上「全球化」（仍然是在從雅典飛往蘇黎世的客機中，我從另外一份

報紙中得知，為了護衛法國美食傳統，連廚師都在談「全球化」，顯然這個字眼相當流行），「彈性化」、「稅率的降低」（沒有說是什麼稅）、「競爭力」、「生產力」等等。

這種經濟意味濃厚的說法，之所以能散布到經濟圈以外，是因為有一群人的推波助瀾，政治人物、記者，還有那些泛泛之輩，懂得一點經濟學皮毛就自認為可以去宣揚那些不當引用的經濟學字眼。媒體灌輸所造成的效果，可以從記者的問題中看出端倪，記者看起來就像是在迎合提梅耶先生：答案在問題之前似乎早就人盡皆知。正是透過這種潛在的勾結串聯，使得所謂的新自由主義觀可以通行無阻，而新自由主義，其實是保守主義的觀點，是建立在一種過時的信仰上，相信生產力至上之歷史必然性，而唯一的調節機製就是個別廠商之間的競爭意願。或許，這麼多和我同輩的人之所以會從某種馬克思主義的宿命論，輕易地轉變到某種新自由主義的宿命論，或許並不是偶然的：在這兩種主義之下，經濟主義，都使人去責任化及去動員化，都在去政治，都強制一系列不容置疑的目的，像最大成長率、競爭力、生

產力。把德國央行總裁當做思想大師，等於是接受這樣一種哲學。令人比較吃驚的是，這種宿命觀，透過一連串圍繞著自由、自由化及開放等文字遊戲，或委婉的說詞，或玩文字的雙重遊戲，例如「改革」這個字眼，看起來讓人以為是自由化的訊息，其實目的是把復辟裝扮地像是一場革命，實際上玩的是所有保守革命都會玩的遊戲。

再回來看提梅耶先生言論的關鍵字：**市場信心**。他的優點在於清楚地闡明擺在所有政權面前的歷史選擇：在市場信心及人民信心之間，必須做個選擇。但是在維護市場信心的政策，會失去人民的信心。根據一項對政治人物觀感的民意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譴責政治人物沒有能力聽取和考量法國人民的心聲，特別是國家陣線支持者對此最不滿，我們雖然遺憾國家陣線勢力的竄起，卻一點也沒有想到國家陣線和國際貨幣基金的關係（對政治人物的絕望，在18歲到34歲的年輕人、工人及雇員、共產黨及國家陣線的支持者之間特別明顯。在所有的政黨支持者裡都算不低，這個不信任的比率，在社會黨的支持者當中，也高達64%，這和國家

陣線勢力的上升有關)。如果我們把金融市場的信心(要不顧代價地挽救)和公民的不信任放在一起來看,我們或許可以看得更清楚病原在哪裡。經濟學是(除了幾個例外)一個抽象的學科,建基在經濟和社會(經濟主義的定義)間毫無根據的二分法。這一二分法正是所有政策失敗的根源,因為這種政策只知道要維護「經濟的穩定及秩序」,而提梅耶先生正是這個新上帝的虔誠傳教士,這個只因某些人的政治盲目所導致的失敗,卻要由我們所有的人來負擔。

佛立堡, 1996年10月

[1] 提梅耶:從1962年起就先後在德國的經濟部和財政部任職,1999年自德國銀行總裁位置上退休,他被認為是德國馬克的守護者,在經濟政策、建設歐洲、財稅政策和國際貨幣政策上有著豐富實證經驗和研究理念。在統一歐元方面,他是歐洲中央銀行系統和歐元上路的主要創建者。

他曾針對東亞的金融風暴提出了典型德國經濟學者的看法:東亞的新興市場近年來為了加速該區域的經濟發展與吸收國際的資金,均接二連三地放鬆本國的金融市場管制,但是,該地區的金融部門至目前為止尚未能有足夠的經驗與能力,以及完善的制度來掌握這些金額巨大的投機性國際資本流動,並且東亞各國普遍缺乏一套全面

性以結構穩定為導向的經濟與貨幣政策，這個內部潛在的弱點，才是引起國際投資客觀視東亞新興市場的主要原因。

- [2] 1958至1969年執政的戴高樂，其政治信念為歐洲必須在美國和蘇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取得平衡，所以必須建設歐洲人的歐洲，而且每個歐洲國家都是獨立具有自決共和精神。68年時戴高樂在左派主張革命的氣氛中，向勞動者提出政治參與政策，使所有法國人都是小資本主義者，小地主。

學者，經濟學及社會運動*

1995年12月的社會運動，是一個規模上，特別是目標上前所未有的運動。如果當時這個運動被大多數法國人及國際人士視為極為重要的一個運動，主要是因為它在社會鬥爭中引進全新的目標。它隱約地帶來一個真正的社會計畫藍圖，而這一計畫不但受到大眾的肯定，且能夠對抗政權當局及言論製造機構中的主流政治及目前當權的保守革命者。

當我自問學者可以為像全國會議之類的大業帶來什

* 這篇文章是為在巴黎舉辦的社會運動全國會議開幕會議所做的發言，時間是1996年11月23到24日。

麼時，我確信學者在場的必要性，特別是在發現保守革命特有的文化及意識形態面向以後。這場12月的運動得到壓倒性的支持，是因為它讓人看起來是要護衛所有社會的社會權益，不是只為了某個特定社會範疇的社會權益——即便有一個特定範疇做先鋒，因為他們最受影響——而是整個社會，甚至可以說所有的社會：這些權益涉及到工作、人民教育、公共交通、所有公共的事物，也就是說，涉及到國家這個制度——不像人們要我們相信的，國家其實並不必然是過時及倒退的。

這個運動之所以出現在法國，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歷史的因素。但是讓觀察家最吃驚的是，這個運動以各種形式繼續進行，不但在法國是出意料的不同形式——誰會料到竟然是卡車司機所帶頭的運動——而且在歐洲也有：目前（1996年）在西班牙；幾年前在希臘；在德國那裡的運動，不但受到法國運動的影響，而且不避諱和法國運動的關係；在韓國——從象徵意義及實際面來看，這又更重要了。這種迂迴多變的鬥爭，我覺得，正在尋找理論上的統一性，特別是實踐上的統一性。法國的運動可以被視為反新自由主義、反保守革命

的世界鬥爭之前鋒，其中的象徵意義十分地重要。然而，我認為所有進步運動的弱點之一，在於他們低估了象徵意義這一面向，所以他們一直缺少威力足夠強大的武器來對付之。和它的敵人比起來，社會運動落後了好幾個象徵革命，因為社會運動的敵人懂得利用政治公關顧問、媒體顧問等等。

保守革命打著新自由主義的招牌，因此看起來很科學，而且是個有行動能力的理論。許多理論在實踐上及理論上所犯的一個錯誤——馬克思主義首當其衝——就是忘了去考量理論的有效性（行動能力）。我們不應該犯這個錯誤。和我們交手的對手，懂得用理論來武裝自己，所以，我認為，要用理論和文化的武器來對抗之。因為專業分工的關係，要領導這場鬥爭，有些人因其本業之故會比另一些人更適合。適合的人裡面，有一些早已是有備而來。他們可以帶來什麼？首先，是一定的權威。我們怎麼稱呼那些在12月的運動中支持政府的人？稱他們為專家嗎？但他們加總起來，也只發揮了一個初出茅廬之經濟學家的一小部分作用。面對權威效果，只能用另一個權威效果來對抗它。

但這還不足夠。科學權威的力量之大，可以發揮在社會運動上，甚至是勞動者意識的深層裡。它之所以有力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它被掌握在似乎是意見一致的一群人身上——一般來說，共識是真理的表徵。這也是因為它建基在似乎是今天思想所擁有的最有力工具上——特別是數學。今天，我們所謂主流意識形態的作用，是靠著對數學的某些運用（這麼說有點誇大，但這是為了提醒我們去注意到下面這一事實：理性化——為了辯護無法辯護的事而用的理由——在今天所找到的一個有力的武器，正是數理經濟學）。這一個意識形態，為一個保守主義的思想穿上純粹理性的外衣，所以要對抗它，必須要用理性、論證、反駁、證明，總之，就是用科學的方法。

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力量之一，在於其看起來像是一種「存有（上帝 *Etre*）的關係鎖鍊」。正如在古老的神學隱喻裡，一端是上帝，然後經過一連串的環節，一直到層次最低下的現實。在新自由主義的星團裡，在最上面取代上帝位置的是數學家，在下面，有一個精神（*Esprit*）的意識形態，雖然這一意識形態並不了解經濟

學，但是它可以靠專業術語的賣弄，讓人誤以為其略懂一二。這個非常有力的關係鎖鍊擁有一個權威效果。即使是在支持者之間，理論（理論使得不管是法國還是德國央行總裁或某某評論家的話有權威性）的權力——主要是社會的力量——也會造成的一些懷疑。因為這並不是一連串論證的結果，而是權威的互聯網，從數學家到銀行家，從銀行家到哲學家—記者，從評論家再到記者。這同時也是金錢、各種經濟社會利益、國際勸誘及考慮所流通的管道。我們社會學家，不用揭發，可以直接去拆解這些網絡，並且證明概念的傳播是如何以權力的傳播為基礎。有一些人提供意識形態的服務，以便換取權位。這裡應該給幾個例子，但是只要仔細察看那有名的「專家請願書」之簽名者就夠了。事實上，有趣的是，平常孤立地工作的那些人之間——即使我們常看見他們出現在電視辯論中相互較量——還有在基金會、協會、雜誌等等之間，他們背後隱藏的關係都會一一曝光。

這些人，用共識的方式，集體地宣揚一種宿命的言論，試圖把經濟趨勢變成一種命運。然而社會法則或經

濟法則等等，只能在當我們任其而為的時候，才會發生作用。假如說保守者是站在自由放任的一邊，那是因為一般來說，這些趨勢法則保存守護現狀，而且需要自由放任來維持。特別是人們不斷向我們提到的金融市場法則，更是保守的法則，需要自由放任才能實現。

針對這點，還必須加以說明、提出論據，特別是要表達出更細緻的差別才行。我對我那稍嫌簡單的說法感到抱歉。有關社會運動的部分，只要能有所謂社會運動的存在就很不錯了；社會運動本身就要經過重重困難，我們不需要再苛求它去做自我辯護。但是對於那些參加社會運動的學者，我們馬上會問：「那你有什麼建議？」我們不必踏入提出政見的陷阱。由政黨機器來提政見就夠了。我們學者可以做的，並非去製造一種反政見，而是創立一種集體的、跨領域的及國際的研究機製，來結合學者、黨工、義工及基層代表等等，於其中，研究者的角色被定義的十分清楚：他們因為其專業的關係，可以很有效地介入工作小組及腦力激盪小組，藉此和運動者聯結。

這一下子就把一些角色排除在外：研究者不會是所

謂的同路人，也就是說，不會是那些簽名請願書的人質、擔保人、掛名的人及藉口，因此我們也不會把他們利用完了以後，就甩開他們；研究者不會是季達諾夫（Jdanov，史達林時代文化政策主導者）式的煽動家，不會因為不甘學術圈的無權而在社會運動裡藉學者之名行集權之實；研究者也不會是專門來教訓人的專家，甚至也不是反專家的專家；研究者也不會是預言家，不會回答所有有關社會運動及其未來的問題。研究者只是那些可以幫助人們定義機構職權的人。或提醒大家，出現在這裡的人，並非代言人，而只是做為一個公民，帶著一些想法和論據來到一個研究和討論的場所，拋開組織機構的綱領、習慣及官腔。這並非總是那麼容易。在那些可能會再出現的組織習慣裡，包括委員會的創設，事前已有的綜合提案等等。社會學教我們組織是如何運作的，如何運用組織運作法規來反制組織。

必須發明研究者及運動者之間新的溝通形式，或他們之間新的分工方式。有一個工作由研究者來做比其他人更適合，就是去對抗媒體洗腦的工作。我們每天一打開收音機，就一定會聽到「地球村」或「全球化」等

等。這些字眼聽起來沒什麼，但是這些字眼的背後，卻是一整套的哲學、一整套的世界觀，以及由此產生的宿命論及臣服。我們可以透過對這些字眼的批評，賦予非專業者特殊的抵抗武器，來對抗媒體的洗腦，反抗權威的影響及電視媒體之操控。今天，要主導社會鬥爭，就少不了有關利用及對抗電視媒體的特殊鬥爭計畫。我推薦相潘紐（Patrick Champagne）的《製造輿論》（*Faire l'opinion*）¹這一本書，因為這本書算是一種政治戰鬥者的手冊。在這個鬥爭裡，對抗媒體學者的鬥爭是很重要的。至於我，這些人倒是不會讓我睡不著覺，當我寫作的時候，也從來不會想到他們，但是從政治的角度來看，他們的角色非常重要，因此，最好是有一群研究者能分出一部分的時間和精力，用參與運動的方式來對抗媒體學者之作為。

另外一個目標是創造象徵行動的新模式。我認為社會運動，除了幾個歷史上的例外，在這一點上，大致來說仍嫌落後。在相潘紐的書中，他指出，有些大規模的動員，在報章上或電視裡，所占的位置，反而不如小型的示威能夠吸引媒體記者的注意。這個意思當然並不是

要去對抗新聞記者，他們自己也受制於工作不穩定的威脅，以及在所有文化事業都會有的審稿制度之影響。但重要的是要知道，我們所能說或做的一大部分，都會被媒體過濾，也就是說，被記者的報導消音。包括我們在此將做的事。這正是一個他們不會報導的意見。

最後一個問題，我會說是自省的問題——這是個重要的字，但是不能沒有根據地亂用。我們的目標不只是一要創新回答，而且要創新回答的方式，創新抗議及動員工作的組織方式。我們學者想到的是，我們一部分的研究可以貢獻給社會運動，而不是像今天一樣地浪費掉，因為今天我們的研究被記者或帶有敵意的詮釋者斷章取義而變得面目全非。我們希望，透過像「行動的理由」(Raisons d'agir)^[1] 這樣的組織，去創造新的表達方式，將最先進的研究成果傳達給活動分子。但是這也意味著研究者必須改變其語言及心態。

再回到社會運動，我認為，就像我剛才所說的，我們所要處理的是各種反自由主義霸權之抗爭運動——應該還可以加上在比利時的學生和教授的罷工，在義大利的罷工等等——通常這些運動之間彼此互不相干（有些

運動所採取的形式可能令人不敢苟同，例如某些基本教義派)。所以至少要整合國際資訊，並且把資訊傳播出去。必須重新創造國際主義，因為國際主義過去被蘇聯專制斷章取義，換句話說，要創新能立足於戰鬥位階的理論思考之形式及實踐行動之形式。大部分主流經濟勢力，是真的能在世界這個層級或跨國界這個層級活動，但是跨國界的抗爭卻仍然處於真空狀態。不只是理論上的真空（因為從來沒有想過），在實踐上也從來沒有跨國界的抗爭，這是因為缺乏一個真正的國際組織，能夠至少在歐洲這個層次上去對抗新保守革命。

巴黎，1996年11月

¹ P. Champagne, *Faire l'opinion*, Paris, Éd. de Minuit, 1993.

[1] 布赫迪厄在1995年的大罷工之中和長期罷工者共同出席集會及對談，接著又在1996年和三十餘位熱心活躍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共同成立了非營利組織「行動的理由」(Raisons d'agir)，並且和其早期經營的期刊《書卷》(*Liber*)結合，形成出版社Liber-Raisons d'agir，意指讀書是為了行動，並推出一系列發揮其「超級批判主義」的廉價小書，在逆反媒體及市場成規運作方式之下，卻有數本書賣出了數萬本甚至十數萬本（售出十一萬本的《論電視》因此被暱稱為小紅書—「布語錄」）。

為一個新的國際主義而寫*

今天，歐洲的人民正處於一個歷史的轉捩點，因為幾個世紀以來，為了勞動者尊嚴而進行的社會、理論、政治的抗爭成果，正受到直接的威脅。我們在這裡或那裡所看到的運動，一個接著一個，發生在整個歐洲，甚至其他地方，一直到韓國；這些在德國、法國、希臘及義大利等等國家接二連三的運動，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沒有相互聯繫，實際上都是對一種政策的反抗，這個政策的形式雖然依照領域和國家而有所不同，但卻都受同一

* 這篇文章是在1997年6月7日於法蘭克福Hesse的DGB第三次論壇所做的發言。

意圖的影響，這一意圖就是要瓦解社會權益，而這些權益，不管怎麼說，都是文明最高的成果；文明所累積的成果，需要的是普及化，擴散到所有的領域，甚至世界化，而不是在經濟上及社會上，以「全球化」或以發展較落後的國家的競爭為藉口，去質疑這些成果。護衛這些社會權益是再自然、再合法不過的事了，而竟然有人想把護衛社會權益等同於某種保守主義或落後行為。我們會把護衛人類文化的成果（像康德、黑格爾、莫札特或貝多芬的作品），當做是保守主義來譴責嗎？我所提到的社會權益，像工作權、社會保險，多少男男女女為此而受苦及奮戰，所以這些權益是多麼珍貴的文化成果，更難能可貴的是，它們不只是存在於博物館、圖書館或學院裡，而是活生生地在人們的生活裡產生作用，引導著人們每一天的存在。這也是為什麼當我看到那些與最粗暴的經濟勢力為伍的人，竟敢譴責站出來護衛自身權益的人（有時這些人還被描述成「特權者」）時，我會感到如此憤慨，而這些護衛自身權益的人，藉著護衛自己的權益，事實上也護衛了所有的男男女女、所有在歐洲或其他地方人民的權益。

幾個月前，我向提梅耶先生所發出的質詢，也常被誤解。這是因為這個質詢所針對的問題，被人不當地提出，而這個問題之所以會被不當地提出，就是因為它是在一個新自由主義的邏輯（提梅耶先生所仗恃的邏輯）下被提出。依照這種觀點，我們承認貨幣統合（以歐元的創造為代表）是必要的大前提，是歐洲政治統合之必要條件及充分條件。換句話說，歐洲的政治統合必然而且不可避免地來自經濟統合。意思是說，如果我們反對貨幣統合政策及其護衛者，這就好像我們也反對政治統合，或更簡單地說，就是「反對歐洲」。

然而卻一點也不是這樣。問題是在於國家的角色（是目前所存在的民族國家，或是尚待創建的歐洲國家），特別是在社會權益的維護當中，社會福利國家的角色（只有社會福利國家能抵抗無情的經濟機製）。我們可以反對提梅耶先生的歐洲（因為他的歐洲只是金融市場的跳板），但卻同時支持另外一個歐洲，這個歐洲，可以透過政策協商，來阻擋市場沒有節制的暴力。我們無法指望銀行家為我們準備的歐洲政策。我們也不能期待靠貨幣整合來確保社會整合。事實正好相反：我

們知道，那些想要在歐元區域內犧牲夥伴以維持其競爭力的國家，只能透過社會保險支出的降低來減少薪資負擔；薪資及社會的傾銷（dumping social），勞動市場的「彈性化」，將成為國家唯一可動用的手段，因為這時國家已經沒有匯率調整的可能性。除了這些機製的效果，或許還要加上貨幣主管當局的壓力，像央行及其領導者，總是不遺餘力地在鼓吹「克難的薪資」。只有一個社會福利的歐洲國，可以對抗貨幣經濟的分裂行動。但是提梅耶先生及新自由主義者，既不要民族國家（被他們視為經濟自由運作的絆腳石），更不要所謂的超國家（他們只想把它縮減到一個銀行）。很清楚的是，如果他們想要藉著剝奪各國權力以擺脫民族國家（或歐洲共同體各國部長會議），當然不是為了要創造一個超國家，讓這個超國家與日遽增的權威，來加諸他們身上那些讓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束縛（特別是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

因此，我們可以反對只建基在單一貨幣的歐洲整合，卻一點也不反對歐洲的政治整合；或正好相反，去呼籲建構一個能控制歐洲銀行的歐洲國，更精確地說，

這個歐洲國，要能預測並控制只剩下貨幣面向的歐洲共同體之社會影響（但依照新自由主義之哲學，要讓社會福利國家所有的痕跡都銷聲匿跡，因為它只是市場和諧運作機能的絆腳石）。

可以確定的是，國際競爭（特別是歐洲各國之間的競爭）會增加在**單一國家內**施行（你們所謂的）「禁止倒退原則」的困難。這一點在縮短工時或經濟振興政策上看得特別清楚（但是事實上，縮短工時的資金可以部分地自給自足，因為生產力很可能會因此而增加，而且還可以回收花在失業者身上的大筆救濟金）。梅傑（John Major）^[1]就很清楚地了解到這一點，他諷刺地說：「你們將會有社會保險支出，而我們會有工作。」德國的企業老闆也懂這點，他們開始把部分企業外移到法國，因為在法國，社會權益受到相當程度的破壞。事實上，如果競爭主要是在歐洲國家之間，而且是法國勞動者搶走德國勞動者的工作，或是德國勞動者來搶走法國勞動者的工作——因為**歐洲國家有將近四分之三的對外貿易，是在歐洲範圍內完成的**——我們可以看到，不減薪的縮短工時政策之效果，將會是微乎其微，除非這

樣一個政策是在整個歐洲的層次上決定及施行的。

同理可用在刺激需求政策或新技術的投資政策上，像新技術的投資如果只靠一個國家來做，將所費不貲，所以由歐洲這個層次來做較為合理。更廣泛地來說，應該包括所有那些由真正的福利經濟原則所指導的行動，因為這些原則能考量到人類行為所有的利益及成本，不管是物質的還是象徵的，特別是有職業或沒有職業所引起的利益及成本。簡而言之，相對於破壞社會權益的金融歐洲，必須提出一個社會福利的歐洲，使其建基在歐洲各國勞動者的結盟上，以便抵銷每個國家的勞動者（特別是透過社會傾銷）所加諸在其他國家勞動者身上的威脅。

在這樣的觀點之下（也為了跳出一個簡單的抽象計畫），需要的是創造一個新的國際主義，而這一工作，首先就落在工會組織身上。但是除了國際主義的傳統形式已經因為屈服於蘇聯專制而名譽掃地，其實國際主義所面臨到的更大困難，是工會結構的國家化（工會不只是和國家結合，甚至是國家組成的一部分）以及工會結構因為不同的歷史傳統而彼此分道揚鑣：例如，在德

國，勞資雙方代表的自主性甚強，但是在法國，是一個弱勢的工會傳統面對一個強勢的國家；同樣地，社會保險的形式也各不相同，從英國是靠稅捐來資助，到法國及德國是靠分攤額來支撐。在歐洲這個層次上，社會保險幾乎不存在。我們所謂的「社會（福利的）歐洲」（歐元護衛者一點也不在乎的歐洲），縮水到只剩下幾個大原則，像「共同體基本社會權益憲章」，也只定義最小權益的基底，而其施行，則交由各會員國自行決定。附錄於《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的社會議定書，則在勞動者的工作環境、資訊及諮詢，及男女間機會平等這些領域上，預留由多數決來通過法規的可能性。並且也預先規定，歐洲勞資雙方代表有權協商集體協議，而這些協議一旦由部長會議通過，就具有法律效力。

這些都說得很美好，但是能夠使歐洲企業老闆接受這樣協議的社會力量在哪裡呢？國際機構，像歐洲工會聯盟，力量非常單薄（例如他們沒有納入一些重要工會，像法國總工會CGT），而他們所面對的是有組織的資方，更矛盾的是，甚至在有關社會權益的領域上，他們也是時常把主動權讓給歐洲共同體機構（以及那些技

術官僚)。歐洲企業委員會或許像我們在某些跨國企業裡的衝突中所看到的，可以成為一個有力的工具，但是，做為簡單的諮詢結構，他們時常碰到分裂他們或使各國相互對立的不同利益。歐洲鬥爭的協調非常落後。工會組織已經錯失許多良機，像德國為每週35小時的工時而罷工時，在歐洲層次上，卻沒有接續的動員；或是在95年末96年初，為反對緊縮政策及反對瓦解公部門的政策，而在法國及許多歐洲國家所進行的大動員。知識分子，特別是在德國，不是沉默不語，就是自甘淪為主流言論的後備軍。

那麼如何在工會層次、學術層次及民眾層次上，去創造一個新的國際主義基地呢？我們可以區別兩種可能的行動方式，而且兩者之間並不互相排斥。首先是群眾的動員，在這種狀況下，特別需要知識分子的涉入，因為有一部分的運動瓦解，是導因於評論家及記者不斷地「宣傳」所造成的士氣渙散，而這些「宣傳」是用讓人不覺得是宣傳的方式來潛移默化。這種動員成功的社會基礎是存在的：我只需提出兩點，一是與學校制度的關係之改變，特別是受教程度的提高、學校文憑的貶值，

及其所帶來的結構性社會地位之下降；另外一點是，學生與體力勞動者間的差距越來越小（老人和年輕人之間的差距、正式任職者及工作不穩定者或無產化者間的差距仍然存在，但是受過教育卻受危機影響的工人階級之下一代之間，卻產生了真實的聯繫關係）。但特別是社會結構的演變，及其社會不平等的加劇，一反廣大的中產階級之迷思（在德國特別明顯），事實上的情況是，資本收入總量暴漲了60%，然而受雇者薪資收入卻維持不變。在這個國際動員之中，需要把重大的一部分放在理念的鬥爭上（切斷經常環繞在社會運動的「工人」傳統，這一傳統從來都沒有給在社會運動中的理念鬥爭一個應有的位置），特別是去批評統治當局及其思想打手所不斷製造及宣傳的再現（利用誤導的統計數字，及有關英美國家充分就業的神話）。

能促進社會福利國家間之國際主義的第二種介入形式，是對目前民族國家動員或透過目前民族國家所做的動員，但是因為缺乏對未來的整體視野，並沒有能力去處理共同體的集體利益。必須要影響民族國家，使其一方面護衛及強化歷來和民族國家息息相關的權益（國家

越強，這些權益通常也越重要，越根深柢固於習慣之中，像在法國的狀況）；另一方面，使這些國家去創造一個社會福利的歐洲國，兼具不同民族國家最先進的社會權益（更多的托兒所、學校及醫院，更少的軍隊、警察及監獄），並使市場統一的設置從屬於社會福利措施的研擬，因為這些社會福利措施是為了對抗自由競爭所帶來的社會問題（這裡，瑞典的例子可以引以為鑑，他們延後加入歐元區，一直到把社會經濟的政策協調重新放到最重要的地位時，才接受歐元）。社會凝聚之重要性，不下於貨幣匯兌問題，而社會協調，是一個真正貨幣共同體成功的條件。

如果我們把社會協調，及社會協調之形成及社會協調所需要的連帶關係，做為一個絕對必要的前提條件，那麼就必須馬上開始協商一些共同目標（以我們對待經濟指數同樣的嚴謹度來做，像《馬斯垂克條約》有名的3%預算赤字^[2]）：對**最低薪資**的定義（考量到區域的差異性，應該使其定義依照區域的不同而不同）；研擬對**抗貪污及逃漏稅**的措施（避免財政上只剩下公共支出的資助，間接導致對勞動的過度課稅），以及對抗競爭者

間的社會傾銷；擬定一個**共同社會權益**，在過渡時期，可以先接受因區域而有所差異的方式，但是目標上，則放在社會福利政策的整合，原先已有的社會權益先整合之，尚未成形的權益則需發展之：例如，為無酬勞工作者及無其他收入者所設立之最低收入、降低勞動負擔、發展像工作權或居住權等的社會權益之形成與擬定、創造在社會福利上的對外政策，以傳播及推廣歐洲社會規範；構思及施行一個符合集體利益的**共同投資政策**：相對於純粹投機或短線操作或完全違反公益的金融活動之投資策略（像把裁員當做是管理績效及營利的保證），我們所著重的策略，是確保無法回收資源的保存及環保、發展跨歐洲的交通網及能源網路、擴充國宅、更新都市（特別是加上環保的都市交通）、在健康及環保上的研發投資、資助財經界看起來似乎是高風險的新興行業（小型企業、獨立作業者）¹。

這些看起來像是一堆不一致措施所構成的簡單目錄，事實上是想要和新自由主義的宿命觀劃清界限，或說，是要「去宿命化」，藉著政治化，用一個福利經濟來取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因為建基在人的主動性及意願

上的福利經濟，會考慮到痛苦的成本及自我實踐的利益，這些都是崇拜生產力及獲利率的經濟主義所忽視的。

歐洲的未來，非常依賴德國的進步力量（工會、社會民主黨及綠黨的力量），以及他們反抗「強勢」歐元政策（德國央行及政府所護衛的政策）的能力和意願。歐洲的未來，也將取決於他們是否有能力帶動及接續許多國家（特別是在法國）對歐洲政策重新定位之運動。簡單一句話，就是要反抗所有不幸的預言者，他們只想讓你們誤以為你們的命運是操之在凌駕一切且獨立無情之勢力（像「金融市場」，或「全球化」機製）的手上，而我想說服你們並且跟你們確認的是，未來，你們的未來，同時也是我們的未來，以及所有歐洲人的未來，是取決於做為德國人及工會分子的你們。

法蘭克福，1997年7月

¹ 我的一些建議是借用 Yves Salessé 的 *Propositions pour une autre Europe, Construire Babel* (Paris, Éditions du Félin, 1997)。

[1] 梅傑：英國前首相。

[2] 為防止加入國預算失控，在《馬斯垂克條約》中規定參與國不得有超額赤字（即預算赤字超過GDP的3%）。之後，在德國鼓吹之下，通過了「穩定與成長公約」。依據該公約，預算超過該一致性標準的國家如果未能於兩年之內降至標準以下，則該國參與條約的無息存款即轉成罰款，不再歸還該國。

電視，新聞業，及政治*

如何解釋《布赫迪厄論電視》(*Sur la television*)這本書竟引起法國當紅的記者們如此激烈的反應？他們所表現出的義憤，或許有一部分是導因於所謂的**文字轉譯效果**，不可避免地，文字使得話語、聲調、手勢、表情、笑容等等非文字的伴隨效果消失，也就是說，對一個善意的觀眾而言，所有那些能馬上顯示出試圖說服人並讓人理解的言論，和攻擊性文章（不管我事前如何否認，他們之中大部分的人仍如此地看待）之間的差異性，都因為文字轉譯效果而消失。但最主要還是導因於

* 這篇文章原是《布赫迪厄論電視》一書英文版的後記。

新聞觀點裡那些最典型的特色，例如喜歡把我們所謂的「(醜聞)曝光」當作新鮮事，或喜歡強調社會裡最直接可見的那一面，也就是說，用一種揭發或指控的觀點來看個人、其所作所為，特別是他們所幹的壞事，而忽視引導思考行動卻看不見的結構及機製（這裡指的是新聞這個場域），但是對這些結構機製的了解，使我們能有更具包容性的理解，而不會只是義憤填膺的控訴（可見性事物的絕對優先性，會造成某種形式的自我審查，使沒有影像或沒有精采畫面的主題被犧牲掉）。或者，只對「結論」（假設性的結論）有興趣，而不在意到達結論的那些步驟和過程。所以我記得，當我的書《國家貴族》（*La Noblesse d'Etat*）（我花了十年的研究成果）出版的時候，有個記者要我參加主題有關法國高等專業學校（*les Grandes écoles*）的電視辯論，節目中，校友會會長將是正方，而我將會是反方。當時，那個記者無法理解我為什麼會拒絕參加這個電視辯論。同樣地，指責《布赫迪厄論電視》的那些「大作家」們，根本就忽視書裡面所使用的方法（特別是新聞報導世界做為一個場域的分析），也因此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的情況下，把這本

書簡化為摻雜零碎爭論的一連串平凡的表態。

但我想要再次說明的，正是這個方法，冒著再次被誤解的危險，我還是要試著指出，新聞報導這個場域，是如何製造及灌輸一種特殊的政治場域觀點，而這種觀點是來自新聞報導場域的結構，以及這個場域裡記者的特定利益。

在像新聞界（特別是電視）這樣的一個世界裡，最怕的是無聊，最在意的是盡可能地消遣，所以政治必然成為一個不討喜的主題，也因此黃金時段裡，要盡可能地避免不刺激、甚至是令人沮喪、而且難處理的政治性主題，或至少要盡可能使它變得有趣。所以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這樣的傾向，不管是在美國或歐洲，社論主筆及調查報導記者越來越讓位給娛樂性主持人，而資訊、分析、深度訪談、專家討論或報導，也越來越讓位給純娛樂，特別是讓位給那些在老面孔及替代性高的對話者之間進行的talk shows之類沒有意義的聊天節目（雖然罪不可恕，我還是要點名幾個這種人物做為例子）。在這些虛假的對話中，為了能真正地理解哪些被說了、哪些不能被說，必須要從細節去分析在美國所謂的小組討

論與談人 (panelists) 的篩選條件：這些人總是有空，也就是說，總是準備好要來參加，而且也準備好要玩那個遊戲，接受什麼都可以說（這是義大利文 *tuttologo* 之定義），回答記者所有的問題，即便是最荒誕最引起反感的問題；他們願意接受一切，也就是說，為了穩固媒體知名度帶來的直接或間接利益，及在媒體裡的聲望，並受邀做有利可圖的演講等等，他們願意接受所有的讓步（對主題、對其他參與者的讓步）、所有的妥協折衷；特別是在某些製作人主導的參加者挑選面試中，他們要注意用清楚而引人注目的詞語來簡單表態，並且避免引用一大堆複雜的知識（依照這個準則：知道的越少越好〔The less you know, The better you are〕）。

但是記者用觀眾的期待來辯護這種煽動式的簡化（卻是違背告知，或寓教於樂的民主目的），其實只是把他們自己的傾向及觀點投射在觀眾身上；特別是害怕無聊（會降低收視率），使他們重對抗而輕辯論，重論戰而輕辯證，集中一切在人物之間的對抗（特別是政治人物），而忽視他們論證間的對立，也就是說，忽視辯論中的焦點，像預算赤字、減稅或外債等問題。因為他們

對於政界的主要認知，是依賴接觸及密談而來的親密性（甚至是來自謠傳或流言），而非基於觀察或調查的客觀性，所以他們自然而然會把一切都引到一個他們最在行的領域，他們會去關注遊戲及遊戲參與者，而忽略遊戲者爭奪的關鍵焦點，著重純粹的政治戰術問題，而不管辯論的實質內容，看到言論在政治場域邏輯中的政治效果（人與人之間聯盟或衝突的邏輯），卻看不到其內涵——當他們還不至於在討論上發明或強制一些純粹造假的東西時。後者像在法國上次的選舉當中，想知道左派和右派間的辯論，是應該兩個人（在反對黨領袖喬斯潘和右派的總理朱沛之間）來參加或四個人（一邊是喬斯潘及其同盟的共產黨羅伯·余〔Robert Hue〕，另一邊是朱沛及其中間派的聯盟李歐塔〔Léotard〕^[1]）來參加；表面上看起來中立，其實是在政治上強行加上的問題，這種辯論其實有利於保守政黨，因為它使得左派間的可能歧異浮出檯面。因為他們在政界的立場曖昧——他們是政治圈裡非常有影響力的角色，卻又非全然身處其中，但又能提供給政治人物必要的象徵服務（他們無法靠自己取得，除非是在文學的領域，在今天還可以靠集

體的力量，來相互「投桃報李」；他們傾向於一種自發性的懷疑哲學，這使他們會從最大公無私的表態中及最誠摯的信仰中，去找出和政治場域位置有關之利益因素（像在一個政黨裡面或一個派系裡的對立關係）。

這些都促使他們（不是在他们們的政治評論預期裡，就是在他們訪談的問題裡）去製造及提供對政界的某種犬儒觀點，政界變得像是某種任由沒有信念的野心家操縱的競技場，受到使他們相對立的競爭利益所擺布（順帶一提，他們的確也是受到政治公關顧問的做法所鼓勵，這些顧問負責在這種刻意組織起來的——卻不必然是犬儒的——政治行銷企劃中協助政治人物，因為要在政治上成功，不但越來越需要政治行銷企劃，而且也要適應新聞報導場域及其代表機製的要求，像大型的政治性節目——「新聞俱樂部」或其他，後者變成真正的政黨預備會議〔caucus〕，越來越能左右政治人物的塑造及其名聲）。這種對政治微觀世界的全神關注——從其中發展的事件，到可以歸咎於它的後果——和一般大眾（至少是最關心政治立場對他們的生活及社會所可能帶來的實質後果的那部分人）的觀點，逐漸分道揚鑣。這

種觀點分歧的情況（在電視明星身上更顯得惡化），又因和經濟社會特權有關的社會距離而強化及加劇。事實上我們知道，六〇年代以來，在美國¹及在大部分的歐洲國家裡，媒體明星除了本來就高得驚人的薪水以外（在歐洲大約100,000美金及以上，在美國是好幾百萬美金），參加talk show、巡迴演講、和報章雜誌的定期合作、「家庭聚會」，特別是職業團體的聚會場合等等，所能獲得的酬勞更是令人瞠目結舌。也因此，在新聞報導場域裡，權力及特權的分配結構之分散，只使得在少數的資本家（必須透過不斷在媒體曝光的方式，維持在演講會或「私人聚會」市場身價的高檔，以保存及增加其象徵資本）旁，發展出一群廣大的次無產階級，這群人因為擔心工作的不穩定性，而被迫進行某種形式的自我審查²。

除此之外，還要加上我已經提過的新聞報導場域中的競爭效果，像搶獨家新聞，偏重不經討論的最新消息及最難取得的消息，或競爭所鼓勵的越來越奇特及弔詭的新聞詮釋，也就是說，時常是最犬儒的觀點，或者是有關事件進展的遺忘症式的預言遊戲，也就是說，那些

不但不花什麼成本（類似球賽打賭）而且保證槓龜完全不會受懲罰的預測及預判，因為新聞本身接近完美的連續性，以及快速替換的合於規範說法，所以也沒有人會記得媒體說過什麼。

所有這些機製引發了一種去政治化的整體效果，或更精確地說，一種去除政治生活魅力的效果。娛樂效果的追求（不需要明確化這種欲求），使得每一次只要政治生活裡出現一個重要的問題，但是看起來卻令人厭煩的時候，媒體就會傾向於把注意力轉移到一個奇觀（或醜聞），或更巧妙一點，把我們所謂的「時事」，變成各種消遣事件的大拼湊，就像辛普森（O. J Simpson）訴訟案件的例子一樣，有點像社會新聞，又有點像一場秀，或變成一連串沒頭沒尾也沒有比重的事件，任意地隨時間上的巧合而被放在一起（一場土耳其的大地震、一項預算限制計畫的介紹、一場大贏的運動比賽、一件引起轟動的案件），到最後只剩下一種荒謬感，因為當事件只剩下當下、即時可以在視覺上被呈現到眼前的部分時，其前因後果早已被刪除殆盡。

那些難以察覺的變化，也就是說，所有那些像是大

陸漂移的程序，無法立即被察覺或感覺到，只有經過漫長的時間，才能完全展現其效果的過程，媒體通常是興趣缺缺，再加上**結構性遺忘**的效果，有利於日復一日只生活在當下的思考邏輯，及把重要者等同於最新事物（獨家新聞及曝光事件）的競爭模式，使得記者傾向去製造一種立即而斷裂的世界再現。因為沒有時間、缺乏興趣和缺乏事前準備好的資訊（記者蒐集資料的工作，通常只限於去翻閱同一主題的報導文章），他們無法把事件（例如在某一所學校所發生的一起暴力事件）放回其所處的關係系統裡（像家庭結構狀態、與其相關的勞動市場，及和勞動市場有關的財稅政策等等），並藉此而跳脫外表的荒謬。無疑的記者的這種傾向，是受到政治人物的傾向所鼓勵，特別是政府部門的負責人，而相對地，藉著所謂的「宣告效果」，記者也使他們把重點放在短期可以見效的政策上，而忽視那些無法立即看到效果的政策。

這種去歷史化、沒有歷史深度、被粉碎的及製造粉碎化的觀點，在電視時事新聞所給予的影像中，找到最典型的代表——一連串外表荒謬最後卻變成彼此相似的

故事，或絡繹不絕的苦難人民，或毫無解釋地出現又毫無解決之道地消失的事件，今天是薩依（Zaire），昨天是比夫拉（Biafra），明天是剛果（Congo），同時因為被去除了任何政治的必要性，所以只能引起一種模糊的人道關注。這些一個接著一個，彼此間卻沒有關聯也沒有歷史深度的悲劇，實在頗類似於那些龍捲風、森林大火、水災等等的自然天災（時事新聞裡也不乏這類報導，它們是新聞報導的傳統題材，如果不說它們是儀式性的題材的話），特別是其畫面精采，採訪不需太費力，受害者卻也沒有比火車出軌或其他意外，容易引起更多的同情或政治上的不滿。

因此，競爭的束縛加上職業習慣，促使電視媒體製造一個充滿暴力、犯罪、族群戰爭、種族仇恨的世界，讓我們每天看到一個充滿威脅卻令人不解又令人擔憂的環境（所以最好遠離世事，自求多福），以及一連串我們既不了解也不能怎麼樣的荒謬災難。因此一種歷史的悲觀哲學逐漸地蔓延開來，鼓勵我們退避三舍及逆來順受，而不是去憤怒及反抗，這種哲學不但沒有動員群眾及政治化的效果，還更加深排外的恐懼心態，就像犯罪

和暴力不斷增加的幻想一樣，只會讓我們為了安全問題而焦慮恐懼。這種世界超出一般人所能控制的範圍，又加上政治遊戲只有專業政治人物才玩得起的印象（有點像高難度的運動，在運動員和觀眾之間，劃上一道不可跨越的鴻溝），結果更加鼓勵（特別是那些較不政治化的人）一種宿命的政治冷漠，明顯使得現狀的維護更加鞏固。

事實上，大概也需要對人民「抵抗」能力（不可否認但卻有限的的能力）的盲目信仰，才會去假設（帶點後現代的文化批判）電視製作人的專業犬儒態度（越來越接近廣告商的工作環境，他們的工作目標——追求最高收視率，所以是追求可以再多一點的收視率，以便賣得更好——及他們的思考模式）將會在觀眾更積極的犬儒態度下（特別是透過遙控機可以隨時轉台的方式），發現其局限性或解藥：把人民對電視「反諷及後設文本」的訊息（電視製作人及廣告商之操縱式犬儒態度所形成的訊息）反省性地去做第三層甚至是第四層更深入的批判性解讀，當做是人民的一種普遍性的能力，這一假設（某些「後現代」詮釋者也持此說），實際上等於是陷入

民粹主義式的學院幻象中最倒錯的一種。

巴黎，1997年6月

¹ Cf. James Fallows, *Breaking the News. How Media Undermine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7.

² Cf. Patrick Champagne, «Le journalisme entre Précarité et concurrence», *Liber*, 29, décembre 1996, pp. 6-7.

[1] 李歐塔：先後經歷右派共和黨主席及法蘭西民主聯盟主席（UDF），第一次左右共治時曾任席拉克內閣的文化部長，在第二次左右共治時任國防部長。

再談電視*

問：在《布赫迪厄論電視》這本書裡，您說必須讓新聞媒體從業者意識到其中看不見的結構。您認為在一個如此媒體化的世界裡，專業人士及觀眾對媒體機製仍盲目無知？或者他們之間是處於一種共犯結構？

布赫迪厄：我不認為媒體從業者是盲目無知的。我認為，他們是活在一種雙重的認知狀態上：一種是讓他們從所掌控的媒體工具中（我談的是他們之中最有**權勢者**）獲取最大利益（有時是出於犬儒心態，有時根本沒

* 這篇文章是在《布赫迪厄論電視》的巴西版出版以後，和P. R. Pires的對談，發表在1997年10月4日里約熱內盧的《全球報》。

有意識到)的現實觀點；一種是帶有說教意味卻對自己非常寬容的理論觀點，這使他們公開否認、甚至是自欺欺人地遮蓋有關他們所作所為的事實。兩個證明：首先，對我那本小書的反應，那些「大作家」們爭相一致地強烈譴責，說這本書了無新意（我發現，和對我有關教育的書之譴責，用的是同樣一種典型的佛洛伊德邏輯）；其次，他們在黛安娜王妃事件中對記者角色所做的擺權威架子又偽善的評論，卻又無恥地剝削這個「非事件」所帶來的新聞賣點。這種雙重的認知——對有權勢者來說非常普遍，應該說他們心照不宣——使得他們可以一方面把對他們行為的客觀描述指控成令人義憤的抹黑或惡毒的口水戰，一方面卻在私下交談或在做調查的社會學者面前——我在我的書裡舉幾個例子，特別是有關「家庭」——甚至在公開的宣言當中，明目張膽地作同樣惡毒的事。比如，為了回應讀者對《世界報》處理黛安娜王妃方式的批評，菲宏茲（Thomas Ferenczi）在9月7日及8日的《世界報》中寫到，事實上，「《世界報》已經改變了」，越來越多的版面是用在他害羞地稱之為「社會事件」，許多是在三個月前他還無法忍受

的報導。當電視所強加的脫軌報導明顯擺在眼前時，我們只能默默承受，聽著一種說教的語調，就像是一種適應現代性及「擴大好奇心」的方式！【1998年1月的作者附記：為了轉移讀者（因為讀者擔心編輯的選擇越來越商業化）的注意力而特別委託的「調停者」，每個禮拜使盡三吋不爛之舌，反覆灌輸，要我們相信球員可以兼裁判。對那些譴責《世界報》走偏成「某種形式的群眾煽動」（有關一個頗遜的作家對一個將退休的熱門歌星所做的採訪），他只知道用報紙的「開放意願」來反駁（在1998年1月18日及19日的《世界報》裡），他說：「我們之所以對這些主題或另一些主題大幅報導，是因為它們讓我們更了解我們周圍的世界，也正因为如此，大部分的讀者都對這些報導感到興趣。」對那些譴責某個記者型知識分子理想（背叛知識分子批判的傳統）所做有關阿爾及利亞狀況只知討好的報導，他在《世界報》1998年1月25、26日裡的答案是：記者不必在知識分子之間作選擇。這些在其慎選之下護衛《世界報》立場的文章，其實是這份報紙最最輕率的作為：新聞工作最深的無意識，隨著讀者的挑戰，在每週長篇大論的分

析裡，反而是一點一點地被暴露出來。】所以，雙重認知存在於主流的新聞從業者身上，在那些利益互通及相互勾結的大記者的特權圈裡¹。基層的記者、跑新聞的記者、自由撰稿的記者，所有那些默默無聞，沒有穩定工作的人，他們所做的，才是真正的新聞工作，他們的意識當然也比較清楚，通常表達也更為直接。一部分也因為有他們的見證，我們才能對電視圈有一定的了解²。

問：您分析所謂的「新聞報導場域」之形成，但是您的觀點是「社會學場域」的觀點。您認為這兩個場域之間，是不相容的？社會學展示的是「真理」，而媒體展示的是「謊言」？

布赫迪厄：您所用的是一種新聞觀點特有的二分法——這是最典型的特色之一——而且往往是**善惡分明**的二分法。當然，記者也有可能會說出真理，而社會學者卻說出謊言。在一個場域之中，本來照定義就會有各式各樣的位置。只是比例會有不同，可能性會有差異。但是話說回來，社會學者的首要之務，就是要粉碎

這種題問題的方式。我好幾次在我的書中說：社會學者可以提供給頭腦清楚及帶有批判精神的記者（這樣的記者有很多，但不必然是在電視台、廣播台或報紙的領導位置），一些認知及理解甚至是行動的工具，讓他們得以有效地掌控壓制在他們身上的社會經濟力量，特別是使他們能藉此和常被視為敵人的研究者結盟。目前我正努力在建立記者和研究者之間的這種國際串連（特別是透過國際雜誌《書卷》〔*Liber*〕來作），並且發展**反抗**那些壓制媒體而使媒體反過來壓制在整個文化生產甚至整個社會的力量。

問：電視被視為一種象徵的壓制形式。電視及媒體的民主可能性為何？

布赫迪厄：媒體負責人所擁有的形象及媒體所賦予的形象上，和他們真正的行動及影響力之間，有天壤之別。整體來說，媒體是一個去政治化的因素，當然最先受影響的，是那些最去政治化的觀眾群，而這群人裡，女性多於男性，教育程度低者多於教育程度高者，窮人多於富人。這麼說可能會引起公憤，但是我們從統計分

析中，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對一個政治問題能清楚回答或不能回答的比例是如何（我在我最近一本書《巴斯卡沉思》（*Méditations pascaliennes*）裡，詳盡地說明這一事實所造成的後果，特別是在政治上）。電視（比報紙更甚）提供一種越來越去政治化、消毒過的，沒有顏色的世界觀，並且導致越來越多的報紙偏向聳動化及商業化。黛安娜王妃事件是我所說的（在我的書裡）最好例證，一種通往極端的路徑。我們在此可以看到所有的現象齊聚一堂：有娛樂效果的社會新聞；電視馬拉松捐獻（*téléthon*）節目之效果，也就是說，沒有任何風險地護衛模糊的而普世的、特別是完全非政治的人道主義活動。這個事件的發生（剛好在巴黎的青少年教皇節慶之後，及德蕾紗修女去世之前），讓我們感覺到連最後的防守線也被衝破了（據我所知，德蕾紗修女在墮胎及女性解放上，並不是一個進步人士，所以非常適合這個由沒有感受的銀行家所統治的世界，反正這些銀行家也不認為幾個虔誠的人道主義者來幫忙包紮銀行家自己所造成的傷口——他們認為是不可避免的，會有什麼大礙）。也因此，在意外發生十五天之後，《世界報》把

這個事件調查狀況刊登在頭版新聞上，然而在電視新聞上，在阿爾及利亞的屠殺、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關係的進展等等新聞，則被縮成節目最後的幾分鐘報導。附帶一題，您剛剛說記者說謊，社會學者說真理；我可以告訴你，做為一個對阿爾及利亞算是熟悉的社會學者，我對法國報紙《十字報》（*La Croix*）感到欽佩，因為他們剛對阿爾及利亞屠殺的真正負責人，做出一份非常詳細、嚴謹又有勇氣的專題。我想問的問題是——到目前為止，答案是否定的——，其他的報紙，特別是那些自認為嚴謹的報紙，會不會採用這些分析……

問：依照艾可（Umberto Eco）在六〇年代所提出的那個有名的二分法，我們可不可以說您是一個對抗「被同化者」（*intégrés*）的「世界終結者」（*apocalyptique*）？

布赫迪厄：可以這麼說。事實上的確有許多「被同化者」。而新統治秩序的力量，在於能找到「同化」（某些情況下，我們可以說是「收買」，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可以說是「吸引」）一群為數越來越龐大的知識分子（在全世界）的特殊方法。這些「被同化者」通常還繼續自

以為是遵循著古老模式的批判者（或簡單地說左派）。這就為他們擁護現狀的行動，帶來強大的象徵效力。

問：您對黛安娜事件中的媒體角色有何看法？這是否可以證明您對媒體運作的假設？

布赫迪厄：這是一個完美的說明，幾乎是我之前所沒料到最糟的一種。摩納哥（Monaco）、英國及其他地方的王室家族，就像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電視連續劇及肥皂劇的主題。總之，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黛安娜王妃之死所造成的盛大「偶發藝術」（happening），只是讓英國及其他地方小資產階級沉醉的一系列演出之一，正如大型音樂劇《艾薇塔》（*Evita*）或《超級巨星耶穌基督》（混和感傷劇及高科技特效），或是賺人熱淚的電視劇、傷感的影片、暢銷通俗小說、簡單的熱門音樂，或所謂的家庭娛樂，總之，就是所有那些守舊又犬儒的廣播及電視台，一整天所播放的文化工業產品，其特色是結合教會讓人熱淚盈眶的說教，及資產階級消遣美學的保守主義。

問：在媒體化的世界當中，知識分子可能扮演的角色為何？

布赫迪厄：在安逸的年代，很難說他們是否能扮演他們傾向於自我期許的積極角色（受啟示的先知）。如果他們能不去和破壞其存在與自由之基礎的市場力量勾結及合作，就已經很不錯了。就像我在我的著作《藝術的法則》（*Les Règles de l'art*）中所指出的那樣，要等好幾個世紀，才使得司法者、藝術家、作家及學者獲得了相對於政治經濟宗教權力的自主性，並且使他們可以在他們各自的領域中，有時甚至是在整個社會中（或多或少成功，像左拉〔Zola〕在猶太人德雷福斯〔Dreyfus〕的間諜冤案中的角色，或沙特〔Sartre〕121團體在阿爾及利亞戰爭的角色等等），建立他們自己特有的規範，他們特殊的價值（特別是他們追求的真理）。這些爭取來的自由，處處受威脅，不只是受軍事將領、獨裁者或黑手黨威脅；還有更陰險的力量，像市場力量，改頭換面成吸引人的外表：其中有些是用形式數學來武裝自己經濟主義者的面貌，而經濟「全球化」在他們的描述之下，將變成無法逃避的命運；另一些，是流行搖滾音樂

的國際明星面貌，代表的是一種雅致而簡易的生活模式（派頭主義的吸引力，有史以來第一次和大眾消費行為及大眾產品結合——像牛仔褲、T-shirt及可口可樂）；還有另一些，是名為後現代的一種「校園激進主義」，透過高舉各種文化混種的虛假革命來吸引人等等。如果有一個領域，那個有名的「全球化」（這個名詞已經成為所有被同化的知識分子的口頭禪）真的存在，那應該是在大眾文化生產的領域裡，像電視（我特別想到的是拉丁美洲特有的telenovela，它所傳播的是一種黛安娜王妃式的世界觀）、電影、大眾報刊，或者更為嚴重的，那就是在報章雜誌上「社會思想」所散布的主題及流通全世界的字眼，像是「歷史的終結」、「後現代主義」或「全球化」。這種最糟糕的「世界化」，藝術家、作家及研究者（特別是社會學家）都有能力也有義務，去對抗它對文化及民主最具破壞性的後果。

巴黎，1997年9月

¹ 有關此一勾聯，參閱S. Halimi, *Les nouveaux chiens de garde*, Paris,

Liber-Raisons d'agir, 1997

- ² 我們可以參考下列書中傑出的分析：A. Accardo, G. Abou, G. Balbastre, D. Marine, *Journalistes au quotidien. Outils pour une socioanalyse des pratiques journalistiques*, Bordeaux, Le Mascaret, 1995.

這些宣稱我們不負責任的「負責人」*

對所有那些我們所選出來的，卻說我們不負責任（當我們提醒他們對我們所做的承諾時）的「負責人」，我們已經受夠了他們的遲疑和拖延了。我們也已經受夠了他們所容許的國家種族主義。甚至在今天，我的一個朋友，他是阿爾及利亞裔的法國人，他告訴我他女兒的故事，他說當她要去大學註冊時，一個學校職員理所當然地要求看她的證件及護照，只因為她的名字聽起來像

* 這篇文章是發表在1997年10月8日的 *Les Inrockuptibles* 裡，有關法國國籍及在法外國人入境及居留之 Guigou 及 Chevènement 法案。

是阿拉伯文。為了和這些羞辱與刁難（這在幾年前還是無法想像的事）做個了結，必須要和虛偽的立法（這個立法是對極右的國家陣線相當大的讓步）做個清楚的決裂。當然要廢除巴斯括（Pasqua）及德布黑（Debré）法案^[1]，但是更要和所有政客虛偽的說法做一個了結，特別是當我們正在重新審視法國官僚在屠殺猶太人一事上的屈膝求和時，那些能在官僚體系中隨便暴露其最愚蠢的排外情緒的人（像剛才我所提到的學校職員），政客們卻允許他們幾乎是暢所欲言。沒有必要從法律上的討論來比較某某法案和某某法案的相對優缺點。只要廢除那一條為公務人員的歧視行為合法化的法律就好了，因為這一惡法本身，就足以使人另眼看待外國人——當然不是隨便什麼外國人。哪有一個公民必須無時不刻地證明其公民資格？（許多阿爾及利亞裔的法國家長，自問要給他們的小孩什麼樣的名字才不會惹禍上身。那個騷擾我朋友女兒的公務員，很訝異為什麼她叫做梅蘭妮 [Melanie]……）

我認為一個法律如果可以讓任何公務員因為外表或姓名（今天這樣的例子每天有上千個），而去質疑一個

這些宣稱我們不負責任的「負責人」

公民之公民資格，那麼這就是一種種族歧視的法律。令人遺憾的是，在喬斯潘所給我們的，如此文明的政府裡，沒有一個恥辱特徵擁有者（一個黑人面孔，或聽起來像阿拉伯文的名字，都算是恥辱特徵，而哪種特徵是恥辱的，則是任由法國官僚專斷的決定），可以用來提醒謝維勒蒙先生（Chevenement）^[2] 法規和習俗的不同，而且有些法規條款還容許最惡劣的風俗習慣。我說這些，是希望能讓那些今天冷漠待之或沉默不語者有所反省，因為在三十年後，當阿爾及利亞裔的年輕法國人都叫做Kekal時，他們將會後悔莫及。

巴黎，1997年10月

- [1] 兩法案都是控制移民的法案，針對獲得法國國籍及在法外國人入境及居留有更嚴格的限制。
- [2] 謝維勒蒙先生：1981年社會黨首次組閣時任研究與技術部和工業部部長，兩年後他首次辭職，以抗議當時左派政府轉向採用右派色彩的緊縮政策，不過在隔年政府改組後，他還是被請出任教育部部長。1988年密特朗競選連任成功後，謝維勒蒙出任國防部長，但在1991年波斯灣戰爭爆發之際第二次辭職，以抗議法國捲入戰爭。兩年後他辭去法國社會黨的一切職務，組建了一個民族主義色彩濃厚，旨在維護國家主權和獨立的「法蘭西公民運動組織」。

防火牆

1997年喬斯潘出任總理，任命謝維勒蒙擔任內政部長，但因不滿喬斯潘政府在柯西嘉省政策上的妥協，加上對治安、移民問題採嚴厲態度不見容於內閣，而在2000年7月三度辭職。2002年參加總統選舉。

今天工作到處都是不穩定的*

在這裡兩天以來所做的集體思考，是具有獨創性的，因為它把不會碰在一起的人（政治及行政主管、工會人士、經濟學及社會學研究者、勞動者——通常沒有穩定的工作，及失業者）湊在一起。我想要提出幾個被討論的問題。第一個問題（被學者會議默默地排除掉）：所有這些辯論的最後，會是什麼？或更粗暴一點，所有這些理性的討論，到底有什麼用？矛盾的是，最擔心這個問題的，反而是研究著，或這個問題最令他

* 這篇文章是在法國 Grenoble 舉辦的「對抗工作不穩定之歐洲交流」所做的發言，時間是1997年12月12-13日。

們擔心（我特別想到的是那些在場的經濟學家，他們的代表性很低，因為在他們的職業裡，擔心社會現實，或說擔心現實者，實在是少之又少），而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直接地提出這個問題（這其實是好事）。這個問題既粗暴又天真，可以喚醒研究者的責任感，而這個責任可以重如泰山，特別是當他們沉默不語，或主動勾結串通時，等於是助長了象徵秩序的維持，而這個象徵秩序是經濟秩序運作的條件。

很清楚地可以看到，今天，工作到處都不穩定。不只在私部門裡，連公部門也是，有越來越多的臨時代理工作，在工業部門裡，也在文化生產傳播機構裡（教育、新聞、媒體），其結果多所類似，而且在失業者這個極端例子上，特別明顯：生存的結構性破壞，其中包括時間結構的被剝奪、人際關係的惡化，然後是與時間空間關係的被拆解。工作不穩定對當事人影響巨大；未來變得不確定，使之無法做理性的預期，但其實卻需要這點對未來最微小的信仰和期望，才能反抗（特別是集體地）現狀——這個最難以忍受的現狀。

工作不穩定的結果，除了對當事人是直接影響之

外，也對其他所有的人造成影響，雖然表面上其他人的工作似乎很穩定。但這種不確定感會一直在那裡；無時不刻地存在每個人的腦海裡（或許除了那些自由派的經濟學家，因為他們享有正式任職者所帶來的保護，使他們免於不安全感之苦，就像他們某個理論對手所說的）。也存在於意識和無意識之中。這一大群文憑過剩所造成的後備軍（不再是能力或專業技術最下者），讓每個有工作的人強烈感覺到其可替代性，他之所以能有工作，是一種特權，一種脆弱而且受到威脅的特權（他的老闆也是用這點來提醒他，當他犯下第一個過錯，或第一次罷工時）。客觀的不安全感形成一種普遍化的主觀不安全感，而在今天，這可以影響到所有的工作者，甚至也會影響到那些沒有（或還沒有）直接受到打擊的人，而正中一個高度發展的經濟核心。這種「集體心態」（我雖然不喜歡用這個詞，但是只要它能說清楚我的意思），每個時代都有，是士氣低落及動員力瓦解的根源，這在落後國家裡可以見到（正如我所觀察到的六〇年代的阿爾及利亞）；這些國家長期的沒有工作及就業不足，使他們永遠活在失業的陰影下。

失業者及工作不穩定者，他們投射未來的能力受到影響，而這一能力又是所有所謂的理性行為之條件，因此從經濟計算行為開始，或在另外一個範疇，政治組織等行為都受到損害，使他們變得無法被動員。矛盾的是，正如我在我最早的，或許是最符合現實的著作——《阿爾及利亞的工作及工作者》（*Travail et travailleurs en Algérie*）¹裡所說的，要構思一個革命計畫，或者說一個合理的野心，以便參照設想的未來來改變現在，需要對現在有起碼的掌控。不同於次無產者，無產者還有現狀起碼的保障及安全感，這是要依所期待的未來來改變現狀的野心，所必須要有的。但是，我順帶要說的是，無產者還有一些東西要護衛，一些他不想失去的東西（他的工作，雖然很累人而且薪資微薄），而他許多被說成是過度謹慎甚至保守的行為，正是因為他害怕跌得更低，成為次無產者。

像今天許多的歐洲國家，當失業率過高，而且很大一部分的人處於工作不穩定的情況（像工人、工商業雇員，甚至記者、教師、學生），工作成為一種稀有的東西，不管什麼薪資都有人要，這使得工作者完全受制於

雇主，雇主可以濫用他們的權力，就像我們每天所看到的一樣。求職競爭（搶工作）再加上職場裡的競爭（這其實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求職競爭），有時甚至不惜任何代價，都要設法保住工作，對抗解雇的威脅。這種有時甚至比企業間的競爭更為野蠻的搶工作，其實是人與人之間相互鬥爭的根源，使得團結互助的價值及人情味都破壞殆盡，成為一種赤裸裸的暴力。那些為現代人特有的厚顏無恥而惋歎的人，不應該忽略造成或鼓勵這種特色的社會經濟條件。

因此，工作不穩定直接影響到當事人（而且使這些人無力動員），間接地影響其他人，不只是因為它所引起的恐懼，而且還因為有系統地利用所謂的**不穩定化**（工作臨時化）策略來製造恐懼，就像那有名的「彈性化」策略——我們這就了解到，其背後不只是經濟動機，還有政治動機。我們開始懷疑，工作不穩定可能不是「全球化」之**經濟必然性**所造成的，而是來自一種**政治意願**。彈性化可以說是故意利用一種不安全感的狀況來從中獲利，而彈性化又同時強化這種不安全感：它壓低成本，而成本要壓低，就要使工作者永遠處於一種會

失去工作的危機感中。所有的生產領域，物質的或文化的，公有的或私營的，都被捲入一個不穩定化（臨時化）的過程當中，其中一例，就是**企業的離地化**（*déterritorialisation de l'entreprise*）：到目前為止仍附著在一個國家或一個地方的企業（汽車工業在美國的底特律或義大利的都靈），開始逐漸脫離土地，透過所謂的「網路化」，在一個大陸或全球的層次上，使生產的各個部門、專業技術、通訊網路及分散各地的養成經歷都能互相通連。

藉著資金流通的便利性，企業更容易外移到薪資低（工作成本低）的國家，工作者間的競爭也因此擴展到世界這個層次。國有（或國營化）的企業，本來其競爭範圍或多或少處於國土之內，並且向外占領國外市場，現在卻逐漸被跨國企業所取代，這使得工作者不再只是和自己的同胞或外派駐紮在本國的外國人（這些外國人其實也是工作不穩定化的第一個受害者）競爭，而且還要和世界另一端的工作者（後者被迫接受微不足道的薪水）競爭。

工作不穩定被納入一種新形式的**宰制模式**中，這種

宰制模式，是建基在不安全感的普遍化及永久化之上，目的在使工作者變得順服，並且接受剝削。為了要點出這種宰制模式的特色（這種宰制效果雖然近似於原始野蠻的資本主義，但就其宰制模式本身而言，是史無前例的），有人提出**彈性剝削**（flexploitation）這個概念，在這裡可以說非常適當，而且非常生動。這個字提到不安全感的理性管理，特別是透過生產空間合謀的操縱，在社會權益最多、工會最有組織的國家（這和一國之領土及國家歷史有關）之工作者，和社會權益上較落後的國家之工作者之間，製造競爭，並且藉著表面中立的機製（此亦用來做為自身的合法化），擊破抵抗的力量，獲得屈服和順從。工作不穩定所造成的屈服態度，是成功剝削的條件，其所靠的基礎，是為數越來越多的不工作者，和為數越來越少的工作者（但其工作分量也越來越重）之間的劃分。所以我覺得，那些看起來像是由不可改變的法則所支配的經濟體制，其實是一種政治體制，而這一**政治體制**之所以可行，是因為有政治權力主動或被動的勾結。

反抗這個政治體制的政治鬥爭是可能的。首先要鼓

勵被剝削的受害者（目前的或潛在的）一起對抗工作不穩定的破壞性效果，以慈善或慈善義工的方式，來幫助他們生活、相互扶持、維持尊嚴、抗拒自我形象的惡化及抗拒疏離，同時因為不穩定化政策的效果是作用在國際這個層次之上，所以也要鼓勵他們在國際層次上去動員，才能戰勝這個不穩定化政策，使這個政策想在各國的工作者之間所製造的競爭，無以為繼。這個政治鬥爭還可以使工作者脫離舊式的鬥爭邏輯（以要求工作和調整薪資為基礎，這個舊邏輯跳不出工作或隨工作而來的剝削——或**彈性剝削**——的框架）。新邏輯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在歐洲的層次上，大量縮短工時），以及重新定義生產及再生產之間、休息及休閒之間的時間。

這個革命必須先放棄算計的個人主義的狹隘觀點，因為這個觀點把人簡化為只顧解決經濟問題的計算者。要使經濟系統能夠運作，工作者不只需要提供他們自己的生產條件及再生產條件，還要提供使經濟系統本身運作的環境，也就是說，工作者對企業、工作及工作必要性等等的信仰。這些都是正統經濟學家一開始就排除於其抽象及歪曲的算計之外的，而且悄悄地把經濟運作下

今天工作到處都是不穩定的

隱藏的所有經濟社會環境的生產及再生產責任，都丟給個人，或更矛盾的是，丟給他們口口聲聲要毀滅的國家。

Grenoble，1997年12月

¹ P. Bourdieu, *Travail et travailleurs en Algérie*, Paris-La Haye, Mouton, 1963 (avec A. Darbel, J.-P. Rivet, C. Seibel); *Algérie 60. Structures économiques et structures temporelles*, Paris, Éd. de Minuit, 1977.

失業者運動，一個社會奇蹟*

這個失業者運動是一個獨一無二的特殊事件^[1]。和新聞媒體整天反覆想灌輸的相反，這個**法國特例**其實是我們可以引以為傲的事。事實上，所有的研究都指出，失業摧毀了受它打擊的人，毀滅他們的防禦力及反抗的傾向。如果這種宿命可以破解，是因為有一些個人和團體不斷地在鼓舞、支持及組織失業者運動。令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一些左派的政治負責人及工會人士，不但沒有承認運動動員的正面效果（我們知道，沒有這些動

* 這篇文章是在1998年1月17日失業者占領高等師範學院時所做的發言。

員，那我們連個社會運動的影子都不會有），反而惡指其操縱。至於我，對所有為了這個社會運動而聚集在工會及協會的全國會議裡，並且使得一個**社會奇蹟**（我們很晚才發現其功德）成為可能的那些人，我堅持要向他們表達我的欽佩和感激——他們的努力看起來越像無望的掙扎，就越是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這個運動最先爭取到的，就是運動本身的存在：它使失業者及所有工作不穩定者（其數目每天還是不斷在增加）脫離隱形、孤立、沉默的狀態，也就是脫離不存在的狀態。藉著重見天日，這些失業者使所有像他們一樣因失業而遭遺忘及活在羞辱中的男男女女，重新存在，及重新獲得某些尊嚴。但是，他們更是要提醒我們，經濟及社會秩序的基礎之一，正是大量的失業及其對尚有工作者的威脅。他們不但沒有自閉於一個自私的運動，反而表示，就算是有這種或那種的失業者、領取最低收入（RMI）者、不再擁有失業救濟金的失業者或有權領取特殊救濟金的失業者之間的類似性，其實是相當於失業者 and 所有工作不穩定者間的類似性。我們常會忘記而且也有人忘記這一根本事實，尤其當我們只強調

「各類」（如果我們可以這麼說！）失業者的要求時，我們等於是把他們和工作者（特別是他們之中工作最不穩定者）分開來，而這也使這些工作不穩定者常覺得被遺忘。

而且，失業和失業者，也困擾著工作和工作者。兼差的、臨時雇用的、候補的、時有時無的、短期合約的工作者，工業、商業、教育、戲劇或電影的臨時工等等，即使這些人和失業者有所不同，而且他們之間也有所差異，但是他們都活在害怕失業的恐懼中，以及藉失業來對他們敲詐的威脅之中。工作的不穩定使得宰制及剝削的新策略可以得逞，而今天，解雇的威脅存在於所有的階層，不管是在公營還是私營企業裡，整個職場都受其影響，特別是文化生產企業裡，令人窒息的審查制，嚴禁任何的動員及要求。失業使得（甚至是有利於）工作環境普遍地惡化，而這是因為他們隱約可知，許許多多的法國人都感覺到自己 and 失業者的這類鬥爭是休戚與共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可以說，其存在本身構成瓦解動員的主要因素的那些人所形成之動員，是對動員及與政治宿命之決裂的最好的鼓勵。

法國失業者的運動，也在呼籲歐洲所有的失業者及工作不穩定者：一個新的顛覆性理念出現了，這一理念可以成為一個鬥爭的工具，而每個國家的運動都可以運用之。失業者提醒所有的工作者，他們和失業者是同夥的；這些影響工作者也影響其工作環境的失業者，其實是某種政策所造成的後果；一個能超越各國之內工作者與非工作者之分，以及超越一國（之所有的工作者和非工作者）與其他國（之所有的工作者和非工作者）之分的動員，或許才能對抗那個藉非工作者使工作者（那些擁有不確定的「特權」可以獲得一個或多或少不穩定的工作者）乖乖閉嘴的政策。

巴黎，1998年1月

[1] 自九〇年代失業率增高以來，失業者問題在工會討論中常流於形式，所以失業者決定自己組織運動，布赫迪厄也參與了這個市民社會的自發性運動。

破壞性的知識分子*

所有那些許多年來日復一日在那裡接待阿爾及利亞難民，聽他們訴苦，幫助他們寫履歷表，奔走於各部會之間，陪他們上法院，寫信給行政單位，派代表去有關當局，要求簽證、許可、居留證，所有那些從1993年7月第一波暴行^[1]就開始動員的知識分子，不只是為了盡可能地提供協助和保護，也為了了解狀況及使人了解一個複雜的現實，以及所有那些努力不懈地奮戰，透過公開介入、記者會、上書媒體，來避免在阿爾及利亞危機中，只有一種聲音被聽到，所有這些各國的知識分子，

* 這篇文章是在1998年1月寫的，尚未發表。

團結起來以對抗冷漠或排外的情緒，提醒我們尊重世界的複雜性，並且揭露某些人的故意混淆，所有這些人突然發現，他們一切的努力，可以一夕之間就被瓦解。

一趟護送之下的旅行（由阿爾及利亞當局或軍隊所規劃、安排及監視的行程）後所寫的兩篇文章，將發表在法國最大的日報上（不但充滿庸俗及誤解，而且還整個導向一個化約的結論，以便敷衍表面的同情和種族的情緒，但也不忘用人道主義的憤怒來妝點門面）。

一個眾口同聲的會議，聚集了從自由主義基本教義派、「根除」狂熱者到投機環保派的媒體界，以及政治界的上流知識分子。一個表面中立其實是完全一面倒的電視節目。就這麼玩了一招。計數器重新歸零。破壞性的知識分子完成其任務：誰要和劊子手、強姦犯及殺人犯（特別是那些我們毫無歷史根據地指為「伊斯蘭瘋子」的人，他們被貼上伊斯蘭教義派的污名，被等同於所有東方狂熱分子的集合，所以也為種族歧視找到道德上及世俗上的最合法的藉口）站在一起？

以這麼誇張的用詞來提出問題，實在不需要用到一個偉大的知識分子。然而這個低下的象徵肅清政策之負

責人（和所有知識分子的定義都相反，因為所謂的知識分子，是面對政權仍保其自由，敢於批評成見，瓦解簡單的二分法，並且重建問題複雜性的人），卻被記者視為貨真價實的知識分子。

然而，我知道有各式各樣的人，明知結果，仍一而再再而三地繼續在其崗位以其所能，去對抗這些勢力，而且還要面對因一份無心、輕率或惡意的報告而毀其所付出的努力之威脅，或萬一成功，也得擔心其成果被投機主義者收編的可能性，但是他們仍執著於澄清事實，反駁或揭穿謊言，雖然難逃被媒體大量灌輸所淹沒之命運，仍堅信最後薛西佛斯的石塊終將往上邁一大步，就像失業者的運動一般（雖然剛開始看起來像某種為政治藝術而藝術般令人絕望的運動）。

就因為，這時仍有一些善於壓制社會運動的政治負責人（然而卻是社會運動把他們推上權位）繼續讓數以千計的「無證件者」^[2]癡癡地等待，或無情地把他們驅逐回他們所逃離的國家（有可能是阿爾及利亞）。

巴黎，1998年1月

- [1] 1991年12月26日，阿爾及利亞舉行三十年來的第一次選舉，長期從事社會工作的宗教組織救世伊斯蘭陣線，在430個席次中獲得188席，贏得第一輪的選舉，卻被政府以該陣線將要進行猶如伊朗激進宗教革命為由，在1992年1月11日禁止了第二輪的選舉，這個選舉無效的宣告，還得到了原殖民宗主國法國的同意，從此，軍政府和宗教組織間的不解之仇，以極端恐怖主義的瘋狂屠殺，每天在阿爾及利亞各地寫下慘絕人寰的歷史。
- [2] 自巴斯括法案控制移民的法案後，居留法國的外國人受到更嚴格的管制，以往未經正式居留簽證入境的外國人在滯留法國多年後，不再獲有正式居留證，所以這些以觀光簽證入境然後未遵守法國法律到期離境的外國人都成了無證件者，因此三百名非洲人在1996年3月18日首先發起無證件者運動，陸續也有阿拉伯人、亞洲人等發起此運動，引起社會大辯論，喬斯潘政府最後給予四分之三此類無證件者予正式居留證。

新自由主義，一個剝削到底的 （正在實現的）烏托邦

經濟的世界真的如主流言論所期望的那般，是個純粹而完美的秩序，無懈可擊地展現可預測結果之邏輯，任何些微的差錯立即被懲罰所制止，不管是藉由自動的方式，或間接透過其左右手像國際貨幣基金或經濟發展合作會議（OCDE）來強制其嚴厲的措施嗎？（如降低勞動成本，減少公共支出及工作彈性化。）如果它事實上也不過是一種烏托邦的實踐呢？（新自由主義烏托邦，雖被轉成**政綱**，仍是一種烏托邦，這一烏托邦透過其所倚靠的經濟理論之助，而自以為是對真實的科學描述。）

自由主義的理論是一個純粹數學的虛構，一開始就建基在一種抽象化之上（這一抽象化，並不能歸結為對現實有意識地選擇性理解以建構科學研究對象之結果，儘管那些護衛抽象化之必然性的經濟學家想要這麼認為）：藉著一種狹隘又嚴格的理性概念（即個人理性）之名，這一抽象化忽視產生理性傾向（特別是做為新自由主義觀點之基礎——對經濟事物的計算傾向）的社會及經濟條件，以及做為其存在條件（更精確地說，是這些傾向及結構之生產、再生產的條件）的社會經濟結構。只要想一想教育系統（從來就不只是個教育系統，因為其在物質及勞務的生產上，以及在生產者的生產上，都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就可以看出其忽視的嚴重性。這個最初的錯誤（屬於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Walras〕式的對純粹理論之迷思），造成後來所有經濟學的缺失和錯誤，以及對其所製造的專斷對立（以建立在競爭及效率的經濟邏輯，對立於以公正為準則的社會邏輯）之必然執著。

但是，這個原為去社會化及去歷史化的「理論」，在今天卻擁有前所未有的資源來使其成為**真實的**（經驗

新自由主義，一個剝削到底的（正在實現的）烏托邦

上可驗證的）理論。事實上，新自由主義的言論並不像其他的理論。正如精神病院裡的精神分析（依照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看法），新自由主義的言論之所以是個強勢而不易打敗的言論，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的言論擁有權力關係世界裡（新自由主義助其成為如今之面貌）的所有勢力，特別是它能一邊引導經濟關係主導者的經濟選擇，一邊在這些權力關係上，又加上了其本身的力量（象徵性的力量）¹。藉著科學認識（實已變成政治行動計畫）之名，來完成一個浩大的**政治工作**（被極力否認，因為表面上，政治似乎是負面的），其目的在創造其「理論」實現及運作的條件；一種**對集體有系統的破壞計畫**（新古典經濟只想認識個人，不管是涉及企業、工會或家庭）。

一個純粹而完美的市場之新自由主義烏托邦（需要靠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實現，是透過對所有政治措施的改造及破壞行動（最近的一個例子，是投資多邊協議〔AMI〕，目的在保護外國企業及其投資以對抗民族國家），其目的在**質疑**所有會阻礙純粹市場邏輯的**集體結構：國家**，其可運作空間不斷地在縮減；**工作小組**，使

得薪水及職業生涯依照個人能力而個人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勞動者之孤立化；勞工權益的**護衛集體**，像工會、協會、合作社；甚至**家庭**，依年齡層而建構的市場使家庭失去其對消費的一部分控制權。新自由主義政綱的社會力量來自其利益代表者（股東、金融操作者、業主、保守政治人物、擁護自由放任政策的社會民主黨人士、財經高官、那些越是不必承受任何風險的人，越是急於鼓吹一種自我消亡的政策）的政治經濟力量，傾向於擴大經濟及社會現實的分裂，藉此在現實中建構符合其理論描述的經濟系統，也就是說，一種機械邏輯，就像一連串牽引經濟行動者的限制。

金融市場的全球化（加上資訊技術的進步）史無前例地確保了資金的流通性，讓急功近利的投資者得以隨時比較大企業的獲利率，以便懲罰失敗者。永遠受這種威脅的企業，適應市場要求的速度必須越來越快；否則，就像我們說的「將失去市場信心」及股東（同樣急功近利）的支持，因為股東越來越有辦法把他們的意志貫徹到**管理階層**，為管理階層設立規範，並且影響其雇用、薪水政策。就這樣建構了彈性化（像短期雇用、代

新自由主義，一個剝削到底的（正在實現的）烏托邦

理工、「企業自動縮編」)的絕對統治，並且在企業的子分公司之間、團隊（被迫要多功能化）之間及個人之間製造競爭（透過工資關係的個人化：個人目標的設定、個人績效評價之面試、薪水高度個人化、依照個人能力及績效來分配獎金、個人化職業生涯、確保幹部——做為依賴層級關係的員工，卻必須同時**獨立地**負責產品、銷售、店面、分公司等——自我剝削的責任化策略、自我控制的要求——依照參與性管理技術，這種控制不只是牽涉到員工，甚至擴及幹部），透過種種理性的服從策略，強迫對工作的過度投資（不只是在負責的工作崗位上，還有緊急工作上），造成集體凝聚力及集體判斷標準的削弱或瓦解²。

這種優勝劣敗的制度，在不安全感、受苦及**緊張**³之中，找到對工作及企業之臣服的原動力，其之所以能如此完美地運作，是因為有**不穩定化的慣習**——不安全感，及在各個層次（甚至最高層次如管理幹部階層裡）都存在的一大群被工作不穩定及長期失業威脅所馴化的**後備勞動力**，這兩者一起造成所謂的不穩定化的慣習。這一經濟秩序（高舉個人自由）的最終基礎，其實正是

失業、工作不穩定及**害怕解雇之威脅**所構成的**結構性暴力**：個人主義個體經濟模式「和諧」運作的條件，及職場個人工作「動機」之來源，歸根結柢，是在於一種群眾現象，即一大群失業者的存在。而且也不能說是一大群，因為失業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孤立、原子化、個人化、去動員化，去團結化。

這一結構性暴力也影響所謂的工作契約（被「契約理論」巧妙地合理化及去現實化）。企業一直到獲得無時不刻的臣服（藉著讓所有時間擔保都消失，使得四分之三的雇用都是短期合約，臨時工作部分不斷地增加，個人資遣越來越不受任何限制）之時，才前所未有地大肆暢談信心、合作、忠誠度及企業文化。這種臣服只能是既不確定又模糊的臣服，因為，工作不穩定、害怕被遣散及企業縮編，都會造成焦慮、士氣低落或因循守舊（這些缺陷都是管理時所可以看到及惋歎的）。在這個既無生氣又無內在連續性的世界，被統治者處於理性世界中被創造物的地位：他們被懸置在一個負責「持續創造」其存在的權力之專斷決定中——正如工廠關門、撤資及外移的威脅所證明及喚醒的那樣。

新自由主義，一個剝削到底的（正在實現的）烏托邦

這種對未來及對自己的強烈不安全感及不確定感（打擊所有處於不穩定狀態的工作者），其特殊之處在於，被丟入後備失業者及工作者之間的分裂源頭，是在**學校文憑所保障的能力**上，這種能力在「技術化」的企業裡，又形成幹部或「技術人員」，以及單純工人或熟練工人（工業層級裡新的賤民階級）之間的分裂。電子化、資訊化及高品質化，使得所有員工必須不斷地學習，在企業裡繼續接受相當於學科考試的訓練，這些，其實都是想透過一種**不夠資格**的感覺（企業階層巧妙地讓人有這種感覺）來加深不安全感。職業階層，到越來越近的整個社會階層，似乎是建基在一種「能力」或（更糟糕的）「智力」的層級上。或許不是工作關係的技術操控及越來越受重視且不斷更新的獲取臣服之策略，也不是在個人、時間、研發及工作上的巨大投資（新的勞動力管理方式及新指揮技術的不斷創新所需要的），而是對學校文憑所保障的各種能力之信仰，才是在私人企業裡（甚至在越來越多的公共職務裡）秩序和紀律的基礎：工作者被迫和負責領導的學校菁英做比較，也要和局限在執行任務且需要不斷地證明自己的雇員及技術

人員做比較，這些注定工作不穩定及沒有安全感（不斷地受到變成資格不足而被裁員的威脅）的工作者，只能對做為個人的自己及其團體更加希望破滅；過去，曾經自傲於其技術及政治傳統的工人組織，如果現在還被視為存在，恐怕也逃不了士氣低落、身價降低、政治幻滅的命運（從運動鬥志的危機中，或更糟糕的，從絕望地支持法西斯極端主義論點中，可以看出這種幻滅的傾向）。

我們因此可以看到新自由主義烏托邦如何在一種爆炸裝置般的現實中體現，而其必要性甚至連統治者都得接受——有時像索羅斯（George Soros）或某某退休基金總裁，還得擔心其支配權的破壞性效果，而只好採行補償性行動（雖然是受到新自由主義邏輯影響），比如說比爾·蓋茲（Bill Gates）的慷慨。正如過去的馬克思主義（從這一點來看，和新自由主義烏托邦有許多共通之處），新自由主義烏托邦激起一種**驚人的信仰**（Free trade faith——對自由貿易的信仰），不只是那些物質上靠自由貿易生活的金融家或大企業老闆等等是如此，還包括那些從其中獲得存在合法性的人，像高級官員及政

新自由主義，一個剝削到底的（正在實現的）烏托邦

客，他們藉經濟效益之名把市場權力神聖化，對會阻礙資本擁有者純個人利益追求之極大化的行政關卡或政治關卡，則要求取消，因為個人利益之追求被建構成理性的模式，他們還要求獨立的中央銀行，並且替經濟主子鼓吹民族國家對經濟自由的服從，取消所有的市場管制（從勞動市場開始），禁止預算赤字及通貨膨脹，將國營企業全面民營化，減少公共支出及社會支出。

經濟學家雖然不必然分享真正信仰者的經濟社會利益，但因為其在經濟學場域的特定利益，使他們對新自由主義烏托邦之信仰的生產及再生產，仍發揮了決定性的助力（不管他們對用數學理性粉飾的新自由主義烏托邦之社會經濟效果有什麼感受）。這些經濟學家因為其經驗和學術養成（時常是完全抽象的、書本的及理論的訓練）和真正的經濟社會現實脫節，他們特別容易搞混邏輯事物和事物的邏輯，就像過去在哲學領域的某些人一樣。他們對從來沒有經過實證檢驗的模型充滿自信，睥睨其他人文學科之成果（從他們數學的視角來看，這些學科缺少純粹性及透明性，也因為如此，他們無法了解這些學科真正的必要性及深層的複雜性），並且參與

協助一種驚人的經濟社會改變，而儘管他們也嫌惡某些變動結果（他們可以贊助社會黨，提供慎思過的建議給在政權當局裡的社會黨人），但並不完全排斥這種變動（就算有些失敗的例子，也可以歸諸他們所謂的「經濟泡沫」），因為它可以為新自由主義極為徹底的烏托邦（他們奉獻一輩子在這一烏托邦上，雖然這有點像某種形式的瘋狂）帶來現實感。

然而，偉大的新自由主義烏托邦實施後，在這個世界上立即可見的效果是：經濟上最先進的社會裡，有越來越多的人飽受痛苦和不幸，貧富收入的差距越來越大，電影、出版品等等自主的文化生產領域逐漸消逝，終有一日，文化產品本身也將步其後塵，因為這個場域越來越商業化，特別是能夠阻止這一惡性循環的集體機製（國家首當其衝，因為國家是一切有關「公共」概念的普遍價值之看護者）也受到破壞，在國家與經濟的上層，或企業裡，優勝劣敗的觀念大行其道，加上對贏家（懂高等數學及高空彈跳）的崇拜，人與人之間無所不爭，無所不鬥，犬儒也成為所有行為的規範。新的道德秩序（建基在對所有價值的推翻）透過媒體，顯現在所

新自由主義，一個剝削到底的（正在實現的）烏托邦

有國家上層代表的表現上，我們看到他們不惜壓低自己的尊嚴，在Daewoo或本田汽車等跨國企業的老闆之前阿諛奉承，或在比爾·蓋茲之流的面前，笑容可掬。

我們是否可以期待，這種政治經濟體制所製造的不幸，有朝一日終將引發一場運動，以阻擋我們陷入萬劫不復之田地？事實上，我們正面對著一個另人訝異的矛盾：在實現新秩序（孤獨卻自由的個人所形成的新秩序）的道路上所面臨的困難，常被歸諸於僵化及守舊，而所有直接而有意識的介入（至少當介入是來自國家時，不管是用什麼迂迴的方法），總是事前就被否定（藉口國家官員只關心自身利益而不了解經濟行動者的利益），且被要求讓位給一種純粹而匿名的機製，即市場（我們忘了市場也是利益角逐的場所），然而，事實上，避免社會秩序崩潰的，卻是正被拆解的舊秩序成員及制度的存活，以及所有層級的社會工作者的努力，加上社會的、家庭的或其他的團結互助（雖然不穩定化的人口仍不斷在增加）。過渡到「自由主義」，是以無法感覺到的方式完成的，所以是難以察覺的（就像大陸的漂移），也因此其長期的效果，也就是最可怕的效果，能避開眾

人耳目。矛盾的是，這些效果也被自由主義所激起的反抗所掩蓋——護衛舊秩序的那些人，在其司法模式或社會互助救濟之中，及其所偏好的慣習之中（如護士、社會救助工作者的慣習），總歸一句，就是在避免社會失序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若不更新再製，將會逐漸衰亡，但是要耗盡社會資本，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之庫存中，動用其隱藏的資源來反抗自由主義。

但是這些「保守」的力量（太容易把他們當做保守力量），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是**抵抗**新秩序的力量，這些力量可以變成顛覆力量——只要我們知道如何引導這場對抗新自由主義思想者的象徵鬥爭（新自由主義者的象徵鬥爭，就是不斷地詆毀過去及現在社會運動的一切歷史成果，及其文字、傳統、代表等歷史遺產）；只要我們知道護衛相對應的機構、工作權、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等等，反抗把這些列入過時之物或視為無用及無法接受之特權的企圖。這一鬥爭並不容易，有時甚至必須反其道而行。**想要把顛覆意圖導向保守或復辟**的保守革命者，乘勢將被其保守行動所激起的護衛行動，轉變成反動的抵抗，他們的保守行動則被自己描述成革命之

新自由主義，一個剝削到底的（正在實現的）烏托邦

舉；保守革命者還乘勢把要求或反抗，抹黑成對「特權」過時而倒退的護衛，然而這些要求及反抗，卻是根植在過去所爭取到的權利之上，而一些倒行逆施的辦法仍威脅著這些權益——最好的例子，就是對工會分子的解雇，或更徹底的，對組織傳統護衛者及資深者的解雇。

因此，如果我們還能抱持一點合理的希望，是因為在國家機構裡及其成員的傾向中（特別是那些最依戀這些機關的人，像小國家貴族），還有一些力量的存在，這些力量，表面上看起來像是在護衛一個消失的秩序，正如人們將指控的那般，其實，為了抵抗考驗，必須努力去發明及建構一個新的社會秩序，這個社會秩序將不以個人利益的追求為唯一的法則，而是會讓位給集體，並且**理性追求集體所設計及同意的目標**。而在這些集體、團體組織、工會、政黨之中，又怎麼能不賦予國家——民族國家，或最好是超國家，也就是歐洲（邁向一個世界國的階段）——一個特殊的位置，因為只有國家才能有效地控制及強制在金融市場上的獲利；只有國家才能阻止金融市場對勞動市場所施行的破壞性行動，並且能夠在工會的協助之下，建構及護衛**公共利益**；而不

管我們願不願意，甚至不惜去玩弄數字，這個公共利益，永遠都不會出自被新自由主義信仰視為人類最高成就的會計觀點（過去，或許我們會說是「雜貨店」式偏狹的算計觀點）之中。

巴黎，1998年1月

- ¹ E. Goffman, *Asiles. Études sur la Condition sociale des malades mentaux*, Paris, Éd. de Minuit, 1968.
- ³ On pourra se reporter, sur tout cela, aux deux numéros d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consacrés aux «Nouvelles formes de domination dans le travail»* (1 et 2), 114, septembre 1996 et 115, décembre 1996 et tout spécialement à l'introduction de Gabrielle Balazs et Michel Pialoux, «Crise du travail et crise du politique», 114, pp. 3-4.
- ³ C. Dejours, *Souffrance en France. La banalisation de l'injustice sociale*, Paris, Éd. du Seuil, 1997.

引用書目

ACCARDO (Alain), avec G. ABOU, G. BALASTRE, D. MARINE, *Journalistes au quotidien. Outils pour une socioanalyse des pratiques journalistiques*, Bordeaux, Le Mascaret, 1995.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L'Économie de la maison», 81-82, mars 1990.

—«La souffrance», 90, décembre 1991.

—«Esprits d'État», 96-97, mars 1993.

—«Les nouvelles formes de domination dans le travail», 114 et 115, septembre et décembre 1996.

—«Histoire de l'État», 116-117, mars 1997.

—«Les ruses de la raison impérialiste», 121-122, mars 1998.

BLOCH (Ernst), *L'Esprit de l'utopie*, Paris, Gallimard, 1997.

BOSCHETTI (Anna), *Sartre et les Temps modernes: une entreprise intellectuelle*,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BOURDIEU (Pierre), *Travail et travailleurs en Algérie*, Paris-La Haye,

- Mouton, 1963 (avec A. Darbel, J. P. Rivet, C. Seibel).
- *Algérie 60, structures économiques et structures temporelles*,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97.
- *La Noblesse d'État*,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9.
- «Le racisme de l'intelligence», in *Questions de sociologie*,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0.
- «Deux impérialismes de l'universel», in C. Fauré et T. Bishop (éds), *L'Amérique des Français*, Paris, Éditions François Bourin, 1992, pp. 149-155.
- CHAMPAGNE (Patrick), *Faire l'opinion*,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90.
- «Le journalisme entre précarité et concurrence», *Liber*, 29, décembre 1996.
- CHARLE (Christophe), *Naissance des intellectuels*,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90.
- DIXON (Keith), «Les évangélistes du Marché», *Liber*, 32, septembre 1997, pp. 5-6.
- DEJOURS (Christophe), *Souffrance en France. La banalisation de l'injustice social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97.
- DEZALAY (Yves), avec D. SUGARMAN, *Professional Competition Power. Lawyers, Accountant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arkets*, Londres-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XI-XIII.
- avec B. G. GARTH, *Dealing in Virtue*, Chicago-Londr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VII-VIII.
- FALLOWS (James), *Breaking the News. How Media Undermine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7.

- GOFFMAN (Erving), *Asiles, études sur la condition sociale des malades mentaux*,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68.
- GRÉMION (Pierre), *Preuves, une revue européenne à Paris*, Paris, Julliard, 1989.
- *Intelligence de l'anti-communisme, le congrès pour la liberté de la culture à Paris*, Paris, Fayard, 1995.
- HALIMI (Serge), *Les Nouveaux chiens de garde*, Paris, Liber-Raisons d'agir, 1997.
- Liber*, «Mouvements divers. Le choix de la subversion», 33, décembre 1997.
- SALESSE (Yves), *Propositions pour une autre Europe. Construire Babel*, Éditions du Félin, 1997.
- THÉRET (Bruno), *L'État, la finance et le social*,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5.
- VIDAL-NAQUET (Pierre), *Les Juifs, la mémoire et le présent*, Paris, La Découverte, tome I, 1981, tome II, 1991.
- WACQUANT (Loïc), «De l'État charitable à l'État pénal: notes sur le traitement politique de la misère en Amérique», *Regards sociologiques*, 11, 1996.

防火牆

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Contre-feux

一個純粹而完美的市場之新自由主義烏托邦的實現，是透過對所有政治措施的改造及破壞行動，其目的在質疑所有會阻礙純粹市場邏輯的集體結構：國家，其可運作空間不斷地在縮減；工作小組，使得薪水及職業生涯依照個人能力而個人化，及隨之而來的勞動者之孤立化；勞工權益的護衛集體，像工會、協會、合作社；甚至家庭，依年齡層而建構的市場使家庭失去其對消費的一部分控制權。新自由主義政綱的社會力量來自其利益代表者的政治經濟力量，傾向於擴大經濟及社會現實的分裂，藉此在現實中建構符合其理論描述的經濟系統，也就是說，一種機械邏輯，就像一連串牽引經濟行動者的限制。

ISBN 986-7895-61-4



00200



9 789867 189561

RH1057

售價：200 元

cité 城邦

麥田出版